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论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年6月8日


版权使用授权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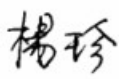
本人完全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收集、保存和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

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

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并提供目录检索与校内阅览服务；

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年6月8日

指导教师签名： 年6月5日

## 摘要

《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是清代宗室弘旺于乾隆年间修纂的记录清太祖至高宗六朝史事的著述。此书对清朝前期的政治、军事、历史人物等均有所述及，可补官修史籍有关记载之阙错，且因视角独特，弥足珍贵。就本人所见，目前学术界尚无人对弘旺及其著述做专门探讨。本文试对弘旺及其著述作初步考察。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参研史料，分析、考证作者弘旺的家世背景和生平事迹。第二部分主要运用版本学、文献学以及比较研究与校勘研究等方法，对《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的版本流传、著书时间、成书背景、写作动机、编纂方法、史料来源、史料价值及编纂缺陷等问题进行探索。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弘旺及其著述在史学上的成就。

关键词：弘旺 《皇清通志纲要》 《元功名臣录》 《松月堂目下旧见》

## Abstract

"Huang-qing Tong-zhi Gang-yao Yuan-gong Mingchen Lu" written by Hongwang, an imperial clan of Qing Dynasty, is a historical book which records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from Taizu to Qian-Long initial stage. In it, Hongwang recorded the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and historical figures in Early Qing Dynasty. It contributes to make up for the omission and error of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official sources. This book possesses the unique view, the academic value and fatal research significance.

"Study on Hongwang's Life and Writings" tries to preliminary investigate Hongwang's life and his writings.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According to analyz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first section states Hongwang's family background, all his life, his circle of friends, and thoughts. The second section studies the works of Hongwa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hilology and bibliology, including of the existence and missing of his works,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 existent work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arious editions of the same wor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riting time, writing background, writing motivation, compiling method, the sour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value. Based on the previous two chapters, the third section of the thesis summarizes the historiography achievements made by Hongwang.

**Key words:** Hongwang, Huang-qing Tong-zhi Gang-yao, Yuan-gong Mingchen Lu, Song-yue-tang Mu-xia Jiu-jian

# 目录

一、弘旺家世及生平考略.....	1
(一) 家世.....	1
(二) 生平.....	4
(三) 堂兄堂弟.....	11
(四) 妻妾子孙.....	11
二、《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研究.....	12
(一) 版本及内容.....	12
1. 《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	12
2. 《皇清通志纲要》.....	13
3. 《元功名臣录》.....	13
4. 《松月堂目下旧见》.....	14
(二) 著书时间.....	16
1. 始修时间.....	16
2. 成书时间.....	16
(三) 著书背景.....	17
1. 官方修史的影响.....	17
2. 私家著史的启发.....	17
3. 爱新觉罗家族的文化传统.....	18
4. 文字狱的影响.....	19
(四) 史料来源.....	20
1. 与《清实录》的异同.....	21
2. 与《八旗通志初集》的关系.....	25
3. 与方略的关系.....	27
4. 与邸报的关系.....	27
5. 亲身经历.....	27
(五) 史料价值.....	28
1. 关于清初“五大臣”的设置时间.....	28
2. 关于八旗始设时间.....	29
3. 关于文馆的记载.....	30
4. 关于军机处设置时间.....	32
5. 关于清初宗室的记载.....	33
(六) 编纂缺陷.....	37
1. 史料取舍欠妥.....	37
2. 史实记载的错误.....	38
3. 史事不够清晰.....	39
4. 内容重复.....	40
三、结语.....	41

# 弘旺及其著述研究

清代宗室弘旺（1708—1762）是康雍乾三朝皇权斗争的一位亲历者。他一生坎坷，因父亲允禩案而身遭缢继，即便是释放之后，也与爵秩无缘，过着清贫生活。但他立志著述，写下《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这部记录太祖至高宗六朝史事的史书。此书对清朝前期的政治、军事、历史人物等都有所述及，视角独特，可补官史之阙误。由于有关弘旺的资料甚少，其著述流传不广，因此尚未见学术界对其人其书做专门研究。本文拟在梳理弘旺生平事迹的基础上，对《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版本流传、成书背景、史料来源和史学价值等问题，试作阐述。

## 一、弘旺家世及生平考略

弘旺，爱新觉罗氏，康熙帝玄烨之孙，和硕廉亲王允禩独子，生于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初五日（1708年1月27日），生母张氏，张之碧之女，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1762年12月16日），享年55岁。<sup>①</sup>

### （一）家世

弘旺之父允禩乃康熙帝第十六子，排行皇八子，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初十日，生母为良妃卫氏<sup>②</sup>。康熙三十七年（1698）三月，允禩受封多罗贝勒，四十七年九月，署内务府内大臣事。在康熙帝诸位皇子中，允禩以聪明能干、礼贤下士著称。康熙帝之兄裕亲王福全赞其“心性好，不务矜夸”；<sup>③</sup>当朝大学士李光地也认为“目下诸王，八王最贤”，<sup>④</sup>南方众文人学士均夸他“极是好学，极是个好王子”。<sup>⑤</sup>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康熙帝突然决定废黜皇太子允禔。<sup>⑥</sup>废黜太子的原因大致有三：第一，任意凌虐王公大臣，专擅威权，穷奢极欲；第二，对诸兄弟非礼相加，对患病的十八阿哥允禩漠不关心；第三，随从康熙帝出巡塞外期间，于夜间潜至御营，裂缝窥伺，心怀叵测（即“帐殿夜警”事件）。然而废黜太子之后，康熙帝旋即生悔，认为允禔因受允禩沮

<sup>①</sup> 《爱新觉罗宗谱》甲册，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0页。

<sup>②</sup> 卫氏，又作魏氏。据《清朝文献通考》卷241载：“卫氏，内管领阿布鼐女。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封良嫔，后晋封良妃。”

<sup>③</sup> 《清圣祖实录》卷235，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戊子，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下同。

<sup>④</sup> 《文献丛编》第3辑，《截铎奏折九》。

<sup>⑤</sup> 《文献丛编》第1辑，《允禩允禔案·秦道然口供》。

<sup>⑥</sup> 《清圣祖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

咒而患有狂易之疾。十月二十三日，召见允弼，并传谕：“自此以后，不复再提往事”<sup>①</sup>，十一月初八日，告知众臣，“今允弼之疾，渐已清爽。”<sup>②</sup>其复立太子之意已然明确。十一月十四日，于畅春园召集满汉文武众臣，明令从众皇子中（大阿哥允禔除外）举奏一人为皇太子，“众意谁属，朕即从之。”<sup>③</sup>康熙帝认为经多次暗示，众臣所推举者必允弼无疑。然而，结果完全出乎康熙帝意料。与会群臣一致保举皇八子允禩为皇太子，令康熙帝“忿恚殊甚……气忿成疾”，当即以“八阿哥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sup>④</sup>为由，断然予以否定。之后，允禩一直受皇父冷落，与储位无缘。五十三年十一月，允禩遣太监向正在塞外巡视的康熙帝送鹰两架，以讨父欢心。然而不知何故，康熙帝收到的竟是两架待毙之鹰，其大怒之下，说出“自此朕与允禩父子之恩绝矣”<sup>⑤</sup>这一决绝之语。五十六年，父子关系因允禩患重病痊愈得到缓解。终康熙之世，允禩在朝中仍有较高威望，周围聚集了允禧、允口、允禔等皇子，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满汉族重臣都是其拥护者。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帝病逝，皇四子胤禛即位，是为雍正帝。允禩对这一意外结局感到惘然和痛心，“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sup>⑥</sup>为稳固局势，雍正帝对此隐忍不发，并任命允禩为总理事务大臣，晋封亲王，命兼管理藩院、上驷院。雍正元年（1723）二月，又命允禩管理工部事务。<sup>⑦</sup>对此，允禩却有清醒的认识：“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sup>⑧</sup>其福晋郭络罗氏也对前来道贺之人说：“有何喜可贺？恐不能保此首领耳！”<sup>⑨</sup>果然，雍正帝待西北安定、朝政稳固之后，便开始清除允禩及其支持者。二年七月，发布《御制朋党论》，矛头直指允禩党人；十一月，发上谕：“自亲王以下、闲散人以上，若有归附允禩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sup>⑩</sup>三年二月，责备允禩党人允禧、允口、鄂伦岱不遵君臣大义，狂悖不敬。<sup>11</sup>三月，革除允禩总理事务之职。四年正月，历数允禩罪状，指出“允禩既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宗姓内岂容有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乎？”<sup>12</sup>二月，将允禩罢黜宗室，降为民王，随即圈禁高墙；三月，改允禩之名为“阿其那”；五月，议其罪四十款颁示全国，内有希图储位、谋为不轨、诡托矫廉、悖逆不敬、挟私怀诈、遇事播弄等语。九月，允禩死于

<sup>①</sup> 《清圣祖实录》卷 235，康熙四十七年十月乙丑。

<sup>②</sup> 《清圣祖实录》卷 235，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庚辰。

<sup>③</sup> 《清圣祖实录》卷 235，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丙戌。

<sup>④</sup> 《清圣祖实录》卷 235，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丙戌。

<sup>⑤</sup> 《清圣祖实录》卷 261，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甲子。

<sup>⑥</sup> 《清世宗实录》卷 45，雍正四年六月甲子。

<sup>⑦</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 4 上，第 7 页，五石斋抄本，北京图书馆藏，下同。

<sup>⑧</sup> 《大义觉迷录》卷 3，见《清史资料》第 4 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29 页。

<sup>⑨</sup> 《清世宗实录》卷 40，雍正四年正月戊戌。

<sup>⑩</sup> 《上谕内阁》卷 26，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sup>11</sup> 《上谕内阁》卷 29，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sup>12</sup> 《上谕内阁》卷 40，雍正四年正月初五日。

姜家房，终年四十六岁。

允禩嫡福晋郭络罗氏是安亲王岳乐的外孙女，和硕额駙明尚之女。郭络罗氏自幼被外祖父抚养长大，性格泼辣。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康熙帝曾传谕指责“允禩受制于妻”。<sup>①</sup>雍正四年正月，雍正帝谕责郭络罗氏：“狐媚残刻，允禩平日甚畏之……圣祖仁皇帝屡降严旨，伊妻始惧，方容允禩收使女一二人，仅生一子一女……”<sup>②</sup>可见弘旺生母张氏原为其父使女。

雍正帝在谕旨中所说的“一女”即弘旺之胞妹，“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五月初八日巳时生，母为媵妾毛氏，毛二格之女；雍正二年甲辰六月，嫁孙氏五福；女乾隆四十年乙未十一月二十一日巳时卒，年六十八岁。”<sup>③</sup>《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有一份“礼部尚书赖都等奏报八阿哥女订婚事折”：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十八日，礼部尚书赖都等谨奏：为请旨事。准总管内务府来文称：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哈哈珠塞太监陈福传旨：谕乾清门侍卫勒希痕、御前侍卫佛伦、都统马五：初二日吉日，指将八阿哥女指配九公主之子。钦此钦遵。咨行到部。此格格封为何衔格格，请皇上指示。俟奉旨后，初定筵席日期，交钦天监衙门查阅。进献聘礼之处依例议奏可也。为此谨奏。请旨。经筵讲官礼部尚书加三级臣赖都、左侍郎革职留任效力赎罪臣王思轼、右侍郎革职留任效力赎罪臣罗瞻、右侍郎加二级臣景日笏、署理仪制清吏司事务祠祭司郎中臣吴贯杰、员外郎臣孙弘、员外郎臣卢祠舒、主事臣常禄、主事臣穆尔图、主事臣沈曾谋。

朱批：多罗格格。<sup>④</sup>

清制，贝勒之女称“多罗格格”，汉译“郡君”。雍正二年（1723）六月，改授“廉亲王允禩女为郡主，婿五福为和硕额駙。”<sup>⑤</sup>可见此时雍正帝尚在笼络允禩集团。奏折中的“九公主”乃康熙之皇十四女，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二月初七日生，生母为贵人袁氏。康熙四十五年，受封和硕恂靖公主。是年五月，下嫁汉军正白旗孙思克之子，散秩大臣、一等男孙承运。孙思克历任振武将军、甘肃总兵官，深受康熙帝信赖。三十九年二月，孙思克死于甘肃提督任上，追赠太子太保，谥襄武。八月，年仅十二岁的承运袭父爵，封为一等男。据相关史料可知，承运、九公主夫妇深受康熙帝喜爱。<sup>⑥</sup>承运逝于五十八年五月，身后留有一子五

<sup>①</sup> 《清圣祖实录》卷 235，康熙四十七年十月丙午。

<sup>②</sup> 《雍正朝起居注册》，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682-683 页。按，据萧奂《永宪录》（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268 页）载，郭络罗氏被革去福晋，逐回外家后，被迫自尽。

<sup>③</sup> 《玉牒·女直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sup>④</sup>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93 页。

<sup>⑤</sup> 《清世宗实录》卷 21，雍正二年六月戊寅。

<sup>⑥</sup> 参见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0-272 页。

福。据《皇清通志纲要》载，五福为公主亲生，且是承运独子。<sup>①</sup>五福与弘旺一样，自幼奉康熙帝之命于内廷行走，并担任侍卫。康熙五十八年，袭父正白旗佐领任。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升任副都统，后任侍郎。

## （二）生平

弘旺虽为宗室，但一生并无爵位，且大半生处于禁锢、监管之中，所以无论是官修史书，还是私家笔记，关于弘旺的记载都很少。现仅就目之所及，对弘旺生平作一初步梳理。

康熙五十二年（1713），弘旺六岁。是年，正逢皇祖父康熙六旬大寿，“诸皇子、皇孙恭进庆祝万寿诗屏并庆祝品物。诸皇子福晋、皇孙女、皇孙媳恭进庆祝万寿绣屏衣服等物……八贝勒长子弘旺进如意玉寿星，万寿古铜鼎，竹寿星，献桃紫晶仙人，仙翁玉水盛，国泰民安玉墨搁。八贝勒女进吉庆如意，万万寿长春玉墨搁，玉寿星，永寿齐天炉，仙鹿玉书镇，献寿银晶仙人。”<sup>②</sup>五十六年（1717）三月初七日，年仅十岁的弘旺奉命“内廷行走”。<sup>③</sup>同一时期在内廷行走的还有：允禧长子弘晟、正白旗吴拜长子朗谈（又作郎坦）、提督孙思克长子孙五福等。<sup>④</sup>综合有关史料看，此处的“内廷行走”或与《皇清通志纲要》中常提到的另一词“幼侍内廷”、“幼侍御前”意思相近。乾隆帝弘历曾言自己幼时被送至宫中养育，皇祖亲自为其督课。<sup>⑤</sup>皇孙中不会只有弘历如此，弘旺、弘晟等在“内廷行走”时，应也受到皇祖亲自训育。这是弘旺一生中的重要时期，此时的经历有助于他了解宫中情况，学习办理政务；也对日后《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的纂修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皇清通志纲要》又载：“康熙六十一年，赐（弘旺）贝勒衔。”<sup>⑥</sup>此处未记具体月份，而《清圣祖实录》、《清世宗实录》等官方史书又避而不载，因而不知是康熙帝所赐，还是雍正帝所赐。从当时的背景推测，雍正帝为笼络政敌允禩，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将二阿哥之子弘皙封为郡王的同时，赐弘旺贝勒衔的可能性较大。弘旺时年15岁，爵位之高在康熙帝诸孙中仅次于废太子之子弘皙。雍正三年（1725），弘旺进入其父允禩所管之工部，学习处理工部事务。<sup>⑦</sup>允禩“颇有办事之材”<sup>⑧</sup>，在父亲教导之下，弘旺能较快熟知朝政事务，并和群臣建立良好关系。这段经历对弘旺以后的际遇及史著创作显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处理

<sup>①</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第70页。

<sup>②</sup> 《万寿盛典初集》卷54，《四库全书》第6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③</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第7页。按，“内廷行走”这一称谓在清代典籍中相对少见，且所指不详。杜家骥认为，“内廷行走”自清初时便已存在，乾隆朝后具有固定意义，指诸王入直皇宫大内，以备随时接受差遣，办理政务。参见杜家骥：《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台北）五南图书1998年版，第343页。

<sup>④</sup> 参见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3第24页，卷4上第8页、卷4下第70页。

<sup>⑤</sup> 《清高宗御制诗》第19册，《甲寅游狮子园·注》，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sup>⑥</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第7页。

<sup>⑦</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第7页。

<sup>⑧</sup> 《清世宗实录》卷18，雍正二年四月庚戌。

工部政务过程中,允禩屡受雍正帝指责训斥。如雍正元年九月,雍正帝因更衣幄次油气熏蒸,“飭廉亲王及工部侍郎、郎中等官跪太庙前一昼夜”<sup>①</sup>;二年十一月,因允禩凡事减省,雍正帝帝谕责其存心阴险,“专事诡诈以术巧取谦让之名”;三年二月,允禩密奏裁减运梓宫夫役和上驷院畜马,以省钱粮,雍正帝谕责允禩“时挟私心,遇事播弄,希冀摇动众志,搅扰朕之心思,阻挠朕之政事。”<sup>②</sup>弘旺亲眼见证了父亲的处事才干与不幸遭遇,这对其以后的性格和心境有较大的影响。

雍正四年(1726)二月十四日,即允禩被削爵黜宗的四日后,弘旺亦被“黜宗室”。<sup>③</sup>三月初四日,“宗人府奏:允禩、允禔、苏努、吴尔占等既已削出宗籍,应将伊等本身,及其子孙俱撤去黄带,更改旧名,归并各该旗、各佐领。其有品级之女一并销去品级……允禩之名及允禩之子之名亦著允禩自身书写,编入佐领。”<sup>④</sup>十二日,“诸王大臣等遵旨将允禩改名之处询问允禩,允禩自改名为阿其那,改伊子弘旺名为菩萨保。”<sup>⑤</sup>同日,弘旺被拘禁。

“阿其那”,满文 akina,其汉文含义,前人已有诸多论述。<sup>⑥</sup>“菩萨保”,满文 pusaboo<sup>⑦</sup>,是满族社会里一个使用普遍的、带有吉祥意义的名字。清时,因受佛、道思想的影响以及萨满信仰的盛行,于是包括满洲、蒙古、锡伯、达呼尔等族在内的北方少数民族形成一种以佛、道神祇为孩子命名的风气。另外,满人入关后易患痘疫,婴儿多早殇,为了能保证子女顺利成长,亦多以神祇命名以求吉祥。除了“菩萨保”外,常见的还有:“观音保”、“娘娘保”、“众僧保”、“千佛保”、“方神保”、“家神保”、“文殊保”、“释迦保”、“地藏保”、“弥勒保”、“天神保”等。<sup>⑧</sup>索额图就给爱女舍里氏取名“众圣保”,<sup>⑨</sup>努尔哈赤之弟穆尔哈奇的

<sup>①</sup> 萧爽:《永宪录》卷2下,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0页。

<sup>②</sup> 《上谕内阁》卷26、卷29、卷31,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十三日、十四日,雍正三年二月十四日、四月十六日。

<sup>③</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第7页。

<sup>④</sup> 《清世宗实录》卷42,雍正四年三月丙申。

<sup>⑤</sup> 《清世宗实录》卷42,雍正四年三月甲辰。

<sup>⑥</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第7页。

<sup>⑦</sup> 萧一山在《清代全史》中解释为“狗”,此说影响甚广。随后相继出现“衰狗”说、“畜生”说、“俎上之鱼”说。参见萧一山:《清代全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2页;玉麟:《“阿其那”、“塞思黑”二词释意》,《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1辑,第249-260页;富丽:《“阿其那”、“塞思黑”新解》,《文史》第10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0页;沈原:《“阿其那”、“塞思黑”考释》,《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90-96页;王锺翰:《三释阿其那与塞思黑》,见王锺翰:《王锺翰清史论集》第2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77-1282页。

<sup>⑧</sup>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32辑(《满文谕旨》第5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0年版,第364页。另参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175-1546-007,转引自沈原:《“阿其那”、“塞思黑”考释》,《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96页。

<sup>⑨</sup> 对此,庄吉发、刘小萌二位先生都进行了相关论述。参见庄吉发:《萨满信仰的历史考察》,(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刘小萌:《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契研究》,《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94页。

<sup>⑩</sup> 沈荃:《清放淑女黑舍里氏圻志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3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曾孙取名叫“菩萨保”。<sup>①</sup>雍正朝还有一个“原任潼关抚民同知、今升凉州知府”的人也叫“菩萨保”。<sup>②</sup>

甚至就在改名的同时，朝中就有一位名叫“菩萨保”的官员，此人也在弘旺获罪之后因隆科多一案获罪。据《上谕内阁》载，雍正五年五月，“镶蓝旗护军七十八家下妇人王氏代伊小叔成儿首告菩萨保收藏隆科多赤金六千五百两”，“菩萨保身系职官，本宜奉公守法，乃与隆科多交结往来，希图护庇……”<sup>③</sup>以往有学者认为此菩萨保就是弘旺<sup>④</sup>，但菩萨保收藏隆科多赤金一案发生于雍正五年，弘旺早已获罪充军，而此菩萨保仍“身系职官”；即便是弘旺获罪之前，也不会以“身系职官”称呼一位亲王之子。另外，《上谕内阁》又载：“刑部又称，菩萨保所藏银一万四千五百两，系伊祖倭黑遗留，并非隆科多寄放之物。”<sup>⑤</sup>“五年七月，刑部审拟主事菩萨保藏匿隆科多应追入官银，听其诡称祖遗给……”<sup>⑥</sup>可见，此菩萨保任职“主事”，乃倭黑之孙，与弘旺不是一人。

综上所述，弘旺改名“菩萨保”<sup>⑦</sup>只是祈福求吉祥之意。允禩希望独子被革除宗室身份后，仍能在菩萨的护佑之下一切平安。

然而，改名的十日之后，即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弘旺被发往热河充军。<sup>⑧</sup>同年九月，允禩“薨于姜家房，柩送至热河，安厝石峒沟左山之阳……”<sup>⑨</sup>看来，弘旺亲自料理了父亲的后事。

根据相关史料所透露的信息，在热河期间，弘旺并非完全“安分守己、改过自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记录了雍正六年（1728），热河总管赫奕、顾彦奏称弘旺殴打行宫千总陈京一案：

二月十三日，赫奕等奏称：正月十六日，行宫千总陈京，因骑马进城门，阿其那之子甲兵菩萨保将陈京之补缎褂、素珠俱撕坏，并殴打。阿其那系大罪人，主子施恩将菩萨保遣往热河披甲，然不安分，侵犯主子之官员、法纪，甚属可恶。将菩萨保送部，严审定拟具奏可也等因具奏。奉旨：著交付赫奕，拿获菩萨保后，会同总管顾彦申明具奏。欽此。

……

<sup>①</sup> 康熙四十五年修纂《宗室玉牒》（直格本），转引自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sup>②</sup>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50，《四库全书》第4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③</sup> 《上谕内阁》卷57，雍正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sup>④</sup> 金恒源：《正本清源说雍正》，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金性尧：《清代宫廷变录》，（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1页。

<sup>⑤</sup> 《上谕内阁》卷57，雍正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sup>⑥</sup> 《钦定八旗通志》卷189，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sup>⑦</sup> 金承艺在《正本清源说雍正》中说弘旺改名佛保，所据不详。

<sup>⑧</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第7页。

<sup>⑨</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第7页。

二月二十五日，热河总管古彦等奏称：奴才等合同讯问，菩萨保用九层铁索将千总陈京锁后，将其补缎褂、珠子撕毁，将伊殴打缘由。据菩萨保供，陈京骑马进城门时，我打了是实，我尚有何辨争之处等语。阿其那是大罪人，主子施恩，令菩萨保披甲，食钱粮、米谷，着妻子归一处，赏给奴婢、银两，然伊不感念高厚之恩，安守本分，竟逞强殴打官员，情由甚属可恶。拟将菩萨保立即正法，菩萨保之母、妻孥交该旗监禁等因具奏。奉旨：伊等此奏知道了。著赫奕返回候旨可也。钦此。<sup>①</sup>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弘旺在热河充军期间的身份是甲兵（满文“uksin”，又称甲士、马甲、披甲），属八旗社会最基层的人员，归佐领所辖。史载，顺治年“甲兵，每名月给饷银二两”，“月给饷米有差”。<sup>②</sup>康熙时规定“甲兵，月给饷银三两”，“每岁给饷米四十六斛”。<sup>③</sup>然而，甲兵份内的微薄收入对比起富贵奢华的王府生活可谓天壤之别。从“陈京因骑马进城门”而被弘旺殴打，似乎可以推测弘旺在热河披甲期间的职责是守护城门。雍正帝未准热河总管古彦等将弘旺“立即正法”的奏请。根据《皇清通志纲要》中的自述，得知这起案件最后处理的结果是“（雍正六年）二月十六日，因事囚之”。<sup>④</sup>

另外，《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中也收录了一条关于弘旺的题本：

二月二十四日，允禄等为重犯菩萨保与看守等结拜弟兄查处失职官员的题本：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题，为议罪事。

先经臣衙门奏称：因菩萨保在热河与看守披甲人达崇阿等结拜兄弟一案，菩萨保现在散禁应锁禁外，将达崇阿、观音保、柏起图、额伦特、穆腾俱移送刑部，连菩萨保一并从重治罪。自菩萨保等结拜弟兄之日起，至提取菩萨保来京之日，所有看守各班章京、兵丁等俱交与兵部查明及总管翼领等一并严加议处。等因具奏。奉旨：菩萨保着照常羁禁，朕另降谕旨，余依议。从前佛伦监看羁禁菩萨保时，携带笔墨入内，未行查出，已将佛伦参处；来文系朕特旨遣往捉拿菩萨保之人，菩萨保于途间携带笔墨行走，来文并未查出，应将来文一并参处。佛伦为伊兄，来文隐忍不举犹可，大人们所司何事，着将来文交与内务府总管严察议奏。再，赫奕系总理热河等处事务之人，诸事俱宜留心详查，菩萨保竟至与看守人等结拜弟兄，伊并不稽查是何意见，着将赫奕唤来问明具奏。钦此。钦遵。随将赫奕自热河唤来讯问：你系热河等处总理事务之人，菩萨保系重罪人犯，于羁禁之所，任其与匪类结拜弟兄，乃漫不觉察，

<sup>①</sup>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1785、1794页。

<sup>②</sup> 《八旗通志初集》卷29，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9页。

<sup>③</sup> 《八旗通志初集》卷29，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0、551页。

<sup>④</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第7页。

是何意见。据供：菩萨保系大罪人犯，奴才理应于羈禁处不时巡查，今菩萨保与看守、兵丁等结拜弟兄，奴才未曾查出，就是奴才的罪，有何辨处。等语。

该臣等议得，查臣衙门原奏内开，自菩萨保等结拜弟兄之日起至提取菩萨保来京之日，所有看守各班章京、兵丁等俱交与兵部查明及总管翼领等一并严加议处。等因奏奉已经交部。赫奕系总理热河等处事务之人，又曾署理总管事务，应听兵部另行议处具奏外，来文系奉特旨遣往热河提取菩萨保之人，凡菩萨保藏匿物件，理宜查检，而菩萨保于途间携带笔墨行走并未查出，殊属不合。应将来文不准折赎枷号一个月，鞭责一百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原件满汉合璧，奖惩类第16件。<sup>①</sup>

这一则史料表明：

其一，弘旺在散禁期间与看守之人结交，且关系较好；看守之人也并未因弘旺是朝廷重犯而有所避忌。从这里可以看出弘旺善于与人交往，而这一点颇似其父允禩。

其二，此案牵连之人众多，既有达崇阿、观音保、柏起图、额伦特、穆腾等处于较低阶层的披甲人，也有来文、佛伦等朝中大臣。来文、佛伦乃镶黄旗内务府总管戴佳氏噶禄之孙、御前侍值海青之子。其父海青，谥果毅，“幼侍内廷，康熙初年御前侍值，数十年未尝离上侧”<sup>②</sup>，历任侍值、御前侍卫、副都统。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雍正帝谕令：“海青自幼随侍皇考，实心効力年久，人材亦好……著赠伊为一品。”<sup>③</sup>佛伦，海青次子，幼侍内廷，任侍卫、御前侍值、包衣昂邦，雍正五年四月任内大臣，十口年革，乾隆七年署内大臣，十一年解任，后任泰陵总管。<sup>④</sup>值得注意的是，佛伦曾“幼侍内廷”，弘旺在“内廷行走”时很有可能与之相识。佛伦、来文，甚至是赫奕，都对弘旺存有不同程度的同情，这一方面要归因于弘旺自身的交结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雍正初年雍正帝所言诸臣“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sup>⑤</sup>，“颇有以允禩为屈抑”<sup>⑥</sup>的情况，在允禩去世五年之后（雍正九年，1731）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其三，佛伦、来文两兄弟获罪的缘由都是因为是在监看或者捉拿弘旺的过程中，未查出甚至暗助弘旺“携带笔墨”。可见，无论是在羈禁之中，还是在押送途中，弘旺均是笔墨不离

<sup>①</sup> 《清代内閣大庫散佚檔案選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9頁。

<sup>②</sup> 弘旺：《皇清通志綱要》卷4上，第55、57頁。

<sup>③</sup> 《上諭內閣》卷1，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sup>④</sup> 弘旺：《皇清通志綱要》卷4下，第62頁，另參見《松月堂日下舊見》第4冊。

<sup>⑤</sup> 《上諭內閣》卷26，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sup>⑥</sup> 《上諭內閣》卷31，雍正三年四月十六日。

身,从而也可窥见其雅文好学的性格和不甘落寞的志向。不论当时弘旺是否已经在撰写史著,或者是否已有修史打算,都为《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的问世埋下了伏笔。

其四,此案的审理结果是:弘旺自热河被押送至京,于景山锁禁;“看守各班章京、兵丁”及“总管翼领等”一并交部严加议罪;佛伦被参处;来文被枷号一月、鞭责一百。此折并未说明对赫奕的处分。据《钦定热河志》载,赫奕于康熙四十二年初设热河总管时,出任该职。雍正元年复任热河总管。然雍正九年的热河总管已经换成了“满洲镶黄旗人巴什”。<sup>①</sup>赫奕的卸任很有可能与弘旺此案有关。

关于雍正朝弘旺的史料,目前所见仅上述两条。两条材料相较,耐人寻味。前一条是因和人交恶而受惩,后一条是因与人结拜而获罪,正好相反。从中我们可以大略窥知弘旺为人爽直、爱憎鲜明的个性,亦可以看出雍正帝忌讳、提防弘旺与他人接触的心理。但从两案处理结果看,对弘旺本人都较为宽大,这既是由于此时的弘旺对当朝统治无从构成威胁;或许也表明雍正帝迫害亲弟之后,内心多少有些内疚,故对弘旺手下留情。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去世。乾隆帝即位之后,为了稳定政局,收揽人心,提出把执政方针改“严”为“宽”,尤其致力于改善皇室内部的紧张关系、缓和家族矛盾。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帝召宗人府王、贝勒、公等面谕:“治国之道,以亲亲睦族,移风易俗为先务”,并严厉指责允禔之子弘春、允祉之子弘曠以监禁父、兄为喜,“为人不孝不悌”。<sup>②</sup>十月,乾隆帝下令释放圈禁的宗室,着手办理“罪黜之宗室、觉罗附载玉牒”,“分赐红带、紫带”。<sup>③</sup>允祉、允口、允禔等先后赐予爵位;被削除宗籍的允禩、允禳、延信、苏努等人的子孙分别赐予红带,收入《玉牒》;未曾受封的宗室也分别赐予爵位,或给予差使。

根据乾隆帝旨意,弘旺及家人也被释放归籍、发还产业:

宗人府和硕裕亲王、臣广禄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今圣主仰副世宗宪皇帝圣意,伊等(注:阿其那等)子孙俱为圣祖仁皇帝后嗣,念恐后日伊等子孙泯灭,特谕施恩准伊等子孙获红带子,纳入玉牒。实乃如天高地厚之恩,既然伊等名字现写入玉牒,伊等所更(恶)名不必写入。伊等名字原并非世宗宪皇帝更赐之名,既然俱为诸大臣等引用古代大罪犯务着落恶名之例,屡奏更改者,仍恢复伊等原名,照例连同罪由一并写入玉牒尾;既然伊等原系正蓝旗满洲人,照常并于正蓝旗满洲宗室佐领;阿其那之子菩萨保,其生母及阿其那二房婢俱并一处生计,按足需以赐官房(三十)(二十)间、田(二十)(十五)顷、人(八)(四)对为家业<sup>④</sup>……菩萨保等照正蓝旗包衣毕里克图佐领红带子全柱等例,每人每月供给三两钱

<sup>①</sup> 《钦定热河志》卷85,《四库全书》第4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②</sup> 《清高宗实录》卷3,雍正十三年九月庚申;《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2408页。

<sup>③</sup> 《清高宗实录》卷4,雍正十三年十月乙亥。

<sup>④</sup> 按,据杨珍先生查满文原档,此处实际拟定数额为:官房二十间、田十五亩、人四对。

粮米，未至年迈者到年迈后，亦照例供给。伊等俱属大罪犯之子，照常不准伊等外行，将伊等由现监禁处移出，交该旗佐领，不准出门，该旗大臣、章京等不时检查，由臣衙亦查之。俟奉旨后，佐领兼管之处，交正蓝旗满洲办理；应给之房、田、人口，交总管内务府照数拨给。奉旨后谨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sup>①</sup>

弘旺在《皇清通志纲要》中也提到：“（雍正）十三年十二月除夕赦之，赐入宗室家产。”<sup>②</sup>他被释放后，归入正蓝旗满洲宗室佐领，并赐予官房二十间、田十五顷、奴仆四对，弘旺等每人每月供给三两钱粮米。

乾隆七年（1742）六月的一道上谕透漏，弘旺虽受所属佐领监管，但仍有一定行动自由：

上谕：前据都统盛安奏称，允禩之子弘旺，在正阳门外过宿等语。弘旺本系锢禁之人，朕因笃念皇祖，将伊等释放。加恩赏给红带子，置立产业，俾得生路。伊等自应守分安居，乃复如此妄为，实属不知悔改。又闻现在侍卫上行走，及闲散近派宗室内，亦有品行卑鄙者。伊等皆系皇祖之孙，无论当差闲居，均应仰体皇祖，顾惜颜面。今竟忘其本源……<sup>③</sup>

现今并未查到都统盛安参奏弘旺的原折，因而事情的具体经过、缘由待考。但弘旺宿于正阳门外，则显违禁令。顺治元年，“定八旗官兵不可城外居住。”<sup>④</sup>顺治五年（1648）八月，谕令汉人一律迁居南城外居住，禁止满汉“参居杂处”。<sup>⑤</sup>《大清律例》卷19：“凡八旗兵丁，无故在城外夜宿者，杖八十。”<sup>⑥</sup>据前引雍正十三年之奏折，弘旺虽“由现监禁处移出”，但“照常不准伊等外行……不准出门”，时隔六年半，弘旺不仅自由出入家门，而且还出城夜宿。何况，“正阳门以南一带地方”在乾隆朝尤被认为是鱼龙混杂之地，乾隆帝再三申饬旗人尤其是宗室不许出正阳门居住。<sup>⑦</sup>弘旺有此违禁之举，主要还是“该旗大臣、章京”看管不严所致，同时多少也反映出其不受约束的性格特点。

<sup>①</sup>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2487-2488页，满文原折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32辑（《满文谕旨》第5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0年版，第363-365页。

<sup>②</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第7页。

<sup>③</sup> 《清高宗实录》卷169，乾隆七年六月己酉。

<sup>④</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3，第7页。按，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25载：“京师八旗满洲官员、兵丁，旧制不得在南城外居住。”

<sup>⑤</sup> 《清世祖实录》卷40，顺治五年八月辛亥。

<sup>⑥</sup> 《大清律例》卷19，《四库全书》第6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⑦</sup> 《清高宗实录》卷442，乾隆十八年七月丁巳。

### （三）堂兄堂弟

为了对弘旺的处境有个更完整的认识，有必要了解一下与允禩一同获罪的允禧、允口的子嗣，即弘晟、弘暄、弘春等人在雍、乾两朝的情况：

弘晟，允禧长子，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一月，雍正四年（1726）获罪圈禁、黜宗，被勒令改恶名“富希浑”（满语系 fusihūn，汉译“下贱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释放，收入玉牒，授为散秩大臣、内大臣。四十七年十二月，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四十八年六月因遣人至静海私收地亩之事革爵，四十九年，授散秩大臣。五十二年十一月卒，终年 82 岁。<sup>①</sup>

弘暄，允口第五子，因前四子皆早夭，实为长子，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五月，雍正九年（1731）因作诗获罪，与其父允口一并圈禁景山，雍正十三年正月于圈禁处所病故，年 28 岁。<sup>②</sup>

弘春，允禔长子，生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九月，雍正元年（1723）封贝子，管武英殿。二年，因党附允禩革爵。四年封镇国公，六年复封贝子，九年晋贝勒，十一年封泰郡王。十二年复降贝子。十三年十一月，乾隆帝下令革爵，改封其弟弘明为贝勒。乾隆四年（1739）正月卒，以贝子例葬，年 37 岁。<sup>③</sup>

以上三人均在雍正朝因储位之争遗案不同程度的获罪。其中弘春因即时转变立场投靠雍正帝而被加封进爵，但乾隆帝即位后，斥责弘春卖父求荣，又革其爵秩。弘晟则是被圈禁时间最长的一位，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弘旺及允禧其余诸子均被释放归宗，乾隆帝特别指出“（塞思黑）长子富希浑，人恶，先世宗宪皇帝时其身为获罪之人，不同于其他诸子”，并下令“照常将富希浑交总管内务府严加监禁”。<sup>④</sup>直至乾隆四十三年，弘晟方被释放，圈禁达 52 年之久。但是即便是弘晟，在释放之后，也被授予官职、爵位，而弘旺则是终身无职无爵。

### （四）妻妾子孙

弘旺成婚年月不详，据年龄及子女状况判断，应该不迟于雍正三年，即在获罪黜宗之前。《爱新觉罗宗谱》载，弘旺有一妻三妾，“嫡妻舒穆禄氏，伦布之女；妾茂怡氏，马尔泰之女；妾完颜氏，四格之女；妾荣氏，荣禧之女。”<sup>⑤</sup>

弘旺共有三子。长子永类（永和）<sup>⑥</sup>，雍正四年（1726）正月二十七日生，生母为弘

<sup>①</sup> 《爱新觉罗宗谱》甲册，第 777 页；《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 2488 页。

<sup>②</sup> 《爱新觉罗宗谱》甲册，第 802-803 页；《乾隆朝上谕档》第 5 册，第 337、340、341 页。

<sup>③</sup> 《爱新觉罗宗谱》甲册，第 895-896 页；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 4 上，第 10 页。

<sup>④</sup>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 2488 页。

<sup>⑤</sup> 《爱新觉罗宗谱》甲册，第 770 页。

<sup>⑥</sup> 因《爱新觉罗宗谱》的人名与《皇清通志纲要》有些许出入，现同时列出，括号内为《皇清通志纲要》的记载。

旺嫡妻舒穆禄氏，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夭折，不足3岁。

次子肃英额（永稷），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生，生母茂怡氏，乾隆六十年（1795）六月十二日卒，年70岁。肃英额“嫡妻孙佳氏，佐领孙承恩之女；妾徐氏，徐德之女；妾王氏，王德之女。”<sup>①</sup>肃英额育有八子：龄安、龄恩、龄贤（瑞显）、瑞臣（瑞辰）、瑞绵、瑞实、瑞健、瑞岱。<sup>②</sup>其中前五子出生时弘旺仍然健在。

第三子永明额（永伶），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十六日生，生母荣氏，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二十日卒，年84岁。嫡妻西林觉罗氏，德永之女；继妻苏完尼瓜尔佳氏，乌隆保之女；妾薛氏，薛禄之女。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永明额任七品笔帖式，后历任主事、理事官、监察御史、宗室学长、副都统、直隶太宁镇总兵、总管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永明额有一子，名绵森，谥端愨，娶子爵哲臣之女他塔拉氏为妻。绵森历任尚书、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国史馆正总裁、太子少保等。<sup>③</sup>

弘旺前两子均生于雍正帝清除允禩集团的最后阶段，而永明额出生时，允禩一案已过境迁，他未受到储位之争的波及，并且得以入朝为官，从七品笔帖式仕至领侍卫内大臣。

## 二、《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研究

### （一）版本及内容

弘旺一生事迹鲜见史籍，但却奋笔撰写了一部近百万字的史著——《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然而，此书在传抄、流传过程中，渐被肢解为《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松月堂目下旧见》三部著述（详见下文），现今分别度藏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处。

#### 1. 《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

笔者检阅各大图书馆馆藏书目，均未见到《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一书。仅据王锺翰先生《清世宗夺嫡考实》指出，《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存有绥福堂珍藏本，原为五石斋（即邓之诚先生）所藏。<sup>④</sup>另外，金性尧《清代宫廷政变录》提到：“弘旺还著有《皇

<sup>①</sup> 《爱新觉罗宗谱》甲册，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0-771页。

<sup>②</sup> 《爱新觉罗宗谱》上没有龄安、龄恩的记载，而《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中记：“稷长子龄安，乾隆丙寅年六月十一日生，丁卯年十二月初五日卒；次子龄恩，庚午二月二十六日生，辛未七年十九日卒。”关于《宗谱》中的龄贤，《纲要》记作瑞显；《宗谱》说其是“乾隆十九年甲戌三月二十四日酉时生”，《纲要》则说是“甲戌年三月二十六日生”。另外，“瑞臣”，《纲要》写作“瑞辰”。两者有些许出入。

<sup>③</sup> 《爱新觉罗宗谱》甲册，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5-777页。

<sup>④</sup> 王锺翰：《清世宗夺嫡考实》，见王锺翰：《王锺翰清史论集》第2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90页。

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sup>①</sup>朱南铎遗作《雕红丛札》中提及：“据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卷一……”<sup>②</sup>但金、朱二文均未注明版本。关于《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一书的作者，金、朱二文均记为弘旺；王锺翰注明为弘曰玉，不知何故，“曰玉”是否为“旺”之误，待考。

## 2. 《皇清通志纲要》

笔者所见有两个版本，一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以下简称“国图本”），一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库（以下简称“北大本”）。

(1)“国图本”：一函五册，为民国抄本。线装，乌丝栏，白口，四周单边，双白鱼尾，每半页10行，每行25字，正文作大字，注文作双行小字，附于本句之下。正文之前有著者自序及目录。文中时有铅笔批校圈点。首册首页钤“明斋秘藏”之印，版框外右下方印有“五石斋抄本”字样。“明斋”、“五石斋”均为民国邓之诚先生号，故知此书为其所藏。全书凡六卷：卷一“太祖朝”，卷二“太宗朝”，卷三“顺治朝”，卷四上“圣祖朝上”，卷四下“圣祖朝下”，卷五缺，卷六缺。据作者自序中所言，本书“自天命前庚辰岁，迄至乾隆十四年，岁次己巳，共计一百七十年之数”，可推测所佚的卷五、卷六应该分别是雍正朝和乾隆朝前期事迹。每一朝之撰写先本朝皇室谱系，次列元勋重臣，随后按时间顺序述及本朝大事，兼列诸臣小传。基本上属编年体，夹杂纪传体格式。

(2)“北大本”：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抄本。线装，一函五册，凡五卷，存卷一至卷四。内容、款式均与国图本相差无几，字迹较国图本规整，无批校圈点痕迹。似据国图本抄录而成。<sup>③</sup>

以上两种版本均非著者原稿本。原本是否存世，待考。<sup>④</sup>

## 3. 《元功名臣录》

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清乾隆十四年（1749）稿本。线装，五卷，一函五册，每卷一册，每册首页右下端钤“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享寿家藏书画印”印章，二印上下排列。《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把《元功名臣录》归为“史部·传记类”。<sup>⑤</sup>

<sup>①</sup> 金性尧：《清代宫廷政变录》，（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2页。

<sup>②</sup> 朱南铎：《雕红丛札》，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3页。

<sup>③</sup> 冯尔康在《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中也提到：“该书只有抄本，原为邓之诚先生所藏，燕京大学据以抄录，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sup>④</sup> 按，王锺翰先生著作的引文中，有三种不同版本：《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注25：“弘曰玉《皇清通志纲要》（邓文如师五石斋钞本）……”《康熙敕谕抚远大将军胤禩档》一文注11：“弘旺所著《皇清通志纲要》：原钞本（全2册，不分卷）……”《年羹尧西征问题》一文注4：“清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原稿本……”（以上出处分别为《王锺翰清史论集》第2册第1088页、第1147页、第1253页。）王先生在同一本书的注解中对《皇清通志纲要》的版本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五石斋钞本”、“原钞本”、“原稿本”。另外，著者名字也出现“弘曰玉”“弘旺”、两种写法。其因待考。

<sup>⑤</sup> 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45页。

本书正文前有自序和目录。自序与《皇清通志纲要》的序大同小异，目录分上部六卷和下部六卷：上部一卷为宗室王贝勒贝子公袭职、民王公侯伯袭职；二卷为元功王贝勒贝子公、八旗满洲元功名臣；三卷为八旗蒙古汉军元功名臣、国朝附归姓氏；四卷为国朝佐领根源、八旗直省军兵、八旗直省马匹、直省里数府州县地丁银米、直省土产；五卷为蒙古部落、国朝属国，六卷缺佚。下部六卷：一卷为顺治年御制诏诗匾额、国朝统兵主帅、国朝议政参赞军机大臣、管宗人府五堂王公、领侍卫内大臣、散秩内大臣、内阁满汉大学士、翰林院满汉掌院学士；二卷为康熙年御制诏诗匾额、国朝元功辅政王贝勒大臣、雍正年御制诏诗匾额、国朝大将军、国朝将军、国初大学士管部务王贝勒、配享王大臣、各庙享祀王大臣、各庙享祀圣贤、春秋享祀祠宇、国朝纂修大臣；三卷为二十四旗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步军统领；四卷为六部二院尚书、奎仪卫内大臣、内务府大臣、六部一院汉尚书；五卷为直省驻防将军都统、直省总督、直省巡抚；六卷为各省巡抚、直省提督。

目录虽分上、下部，实则此书只有上部前五卷；至于下部六卷所示内容与弘旺另一书《松月堂目下旧见》同。关于《元功名臣录》和《松月堂目下旧见》的关系，邓之诚先生在日记里早有提及：“苏寄帆来，以印泥见惠，并示弘旺《元功名臣录》稿本……唯观子目，极与予旧藏《松月堂目下旧见》相同，惜《旧见》前年燕京被封门时失去，无从比对，不知是二书抑是一书，或就《旧见》略有增省之书也。”<sup>①</sup>

#### 4. 《松月堂目下旧见》

本书现藏于浙江图书馆善本特藏库。清钞本，凡六册，不分卷，不著撰述人，无序、无目录。每册书签上钤“松月堂”印，书脑中端标注有册数。此书曾为咸丰年间礼部右侍郎兼工部右侍郎李文田所藏。侍郎据书中“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三十日随上亲征”及“先考皇八子”，定著者为廉亲王允禩之子。<sup>②</sup>《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把《松月堂目下旧见》归为“子部·杂家类”，实则亦可纳入典制体范畴。<sup>③</sup>

关于此书内容，《蕉廊胜录》“松月堂目下旧见”条有载：

“书中纪载，首国初创业主帅，次天聪年主帅，次顺治年主帅以及议政大臣、参赞大臣、随征明大臣，次康熙年议政大臣、参赞大臣，雍正年议政大臣、参赞大臣、军机大臣，乾隆年议政大臣、参赞大臣、军机大臣，次宗人府，次领侍卫内大臣，次散秩内大臣，次内阁，次翰林院，皆详著爵秩姓名，及任事年月。议政、参赞以下，并详其升、授、署、调、降、革、薨、卒，汉人或注其籍贯。（原注：以上仅就所见之第一册言之。）”<sup>④</sup>

<sup>①</sup> 邓之诚：《五石斋文史札记》，见李国章、赵昌平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sup>②</sup> 吴庆坻：《蕉廊胜录》卷5，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5页。

<sup>③</sup> 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36页。

<sup>④</sup> 吴庆坻：《蕉廊胜录》卷5，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5页。

然笔者所见，略有不同：

第三册：世祖御制诏诗匾额，国初创业主帅、天聪年主帅、崇德年主帅、顺治年主帅、康熙年主帅，议政大臣，天聪年参赞大臣、崇德年参赞大臣，顺治年议政大臣，顺治年参赞大臣，军机大臣，康熙年议政大臣，康熙年参赞大臣，雍正年议政大臣、乾隆年议政大臣，宗人府，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内阁，翰林院；

第五册：将军，直省总督，巡抚；

第六册：巡抚，提督；

第四册：六部二院尚书，銮仪卫掌卫事内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六部一院汉缺；

第二册：满洲旗分都统、蒙古固山额真、汉军固山额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步军统领；

第一册：圣祖仁皇帝御制诗、匾额、遗诏，雍正朝匾额，元勋、辅政，大将军，大学士管部贝勒，配享，关帝祠、贤良祠、帝王庙、文庙，历朝纂修书记大臣。<sup>①</sup>

由此可见，《松月堂目下旧见》与《元功名臣录》目录中的“下部六卷”内容基本符合，只是在次序上有所差异。《松月堂目下旧见》“第三册”对应《元功名臣录》的“一卷”；“第一册”对应“二卷”；“第二册”对应“三卷”；“第四册”对应“四卷”；“第五册”对应“五卷”；“第六册”对应“六卷”。册数的混乱定是流传过程中，人们传抄讹误所致，《松月堂目下旧见》应是《元功名臣录》佚失的下部。

弘旺在《皇清通志纲要》自序中说：“余小子今敬阅圣朝五世诸书，谨纂一册，会为一牒，敬名谓皇清通志纲要功勋名臣录。”《元功名臣录》自序云：“余小子今敬阅圣朝五世诸书，会为一牒，名为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可见，弘旺所纂原本仅是《皇清通志纲要元功（或曰功勋）名臣录》一书。因而，从题名看，此“绥福堂珍藏本”更接近于弘旺著述的原貌，应是较为原始的版本。

综上所述，可否推测：《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在流传的过程中，先是被分为《皇清通志纲要》和《元功名臣录》两册；随后，《元功名臣录》上下部散失，从而一书散为今日的三书。《松月堂目下旧见》这个书名应该是后人所加，亦有人称它为《日下旧见》。<sup>②</sup>

<sup>①</sup> 注：笔者所见国图版缩微卷片原件顺序即为此。

<sup>②</sup> 按，章乃炜《清宫述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的征引书目中即标注为：“日下旧见，廉亲王子某。”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提及亦作《日下旧见》。

## （二）著书时间

### 1. 始修时间

《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一书于何时始修，现已无考。从作者生平经历来看，雍正朝大部分时期弘旺处于禁锢之中，连笔墨尚不许携带，著书条件似不具备。且弘旺所著乃史书性质，须有大量史料参考，故这一时期成书可能性不大。因此，弘旺开始修纂《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应该是在雍正十三年十二月除夕被释放以后。《皇清通志纲要》自序中说“余小子今敬阅圣朝五世诸书……此书非表小子之纯工广览……”<sup>①</sup>，只有在乾隆朝，弘旺才有“纯工广览”，“敬阅圣朝五世诸书”的条件。

### 2. 成书时间

《皇清通志纲要》自序云：“宗室十世孙弘旺敬序，皇清乾隆十四年岁次己巳正月元日。”《元功名臣录》自序云：“皇清乾隆十四年岁次己巳四月朔，宗室十世孙弘旺谨纂恭录恭序。”可知此书《纲要》、《名臣录》两部分于乾隆十四年正月、四月先后纂成。然而翻检全书，可发现书中多处叙事涉及乾隆十四年四月之后。如：“一等昭武侯图桑阿：乾隆十年十月口日袭侯，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加号。”<sup>②</sup>“尚书学士韩奕：文工，乾隆十七年口月赐谥。”<sup>③</sup>“正黄旗蒙古旗分都统……署恂郡王允禔：（乾隆）十八年四月兼署。”<sup>④</sup>“乾隆二十年七月口日，纂修平定准噶尔续方略，起康熙三十六年至乾隆二十一年止。”<sup>⑤</sup>“二等果毅公阿里衮：（乾隆）二十三年六月袭兄公。”<sup>⑥</sup>“参赞大臣海明：（乾隆）二十四年派。”<sup>⑦</sup>“刑部尚书刘统勋：（乾隆）二十五年七月仍行走，升大学士。”<sup>⑧</sup>“东阁大学士刘统勋：（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授。”<sup>⑨</sup>“常钧：（乾隆）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调江西。”<sup>⑩</sup>可见，该书纂成后的十余年里，作者一直在不断增补。另外，就笔者目之所及，书中并未见乾隆二十七年及以后的任何信息。因此可以判断，弘旺对全书的增修止于乾隆二十六年。从弘旺去世于二十七年看，《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停修的原因很可能是作者身体渐衰，精力不及。

<sup>①</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1，序。

<sup>②</sup> 弘旺：《元功名臣录》卷1。

<sup>③</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第11页。

<sup>④</sup> 弘旺：《松月堂目下旧见》第4册。

<sup>⑤</sup> 弘旺：《松月堂目下旧见》第1册。

<sup>⑥</sup> 弘旺：《元功名臣录》卷1。

<sup>⑦</sup> 弘旺：《松月堂目下旧见》第3册。

<sup>⑧</sup> 弘旺：《松月堂目下旧见》第3册。

<sup>⑨</sup> 弘旺：《松月堂目下旧见》第3册。

<sup>⑩</sup> 弘旺：《松月堂目下旧见》第5册。

### （三）著书背景

#### 1. 官方修史的影响

清朝自建立伊始，十分重视史籍的编纂。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命儒臣达海巴克什率笔帖式刚林、苏开、古而马浑、托布奇五人翻译汉字书籍，库尔缠巴克什率笔帖式吴把什、查素喀、胡球、詹霸五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sup>①</sup>，此为清国史编修之始。现存《满文老档》即是当时以满文撰写的反映太祖、太宗两朝的史书，也是清代最早的一部官修编年史。入关后，清廷设立了各种常开、例开、特开及“阅时而开”的史馆来专事修辑，将君臣事迹、典章制度、民族关系、文化思想、疆域山川、藩邦属国等等，囊括殆尽，成就之大远迈前代。

在弘旺生活的康、雍、乾三朝，官方修史，尤重国朝功臣列传的纂修。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山东道御史徐树谷奏请纂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国史，获准。<sup>②</sup>四月，诏开国史馆，以大学士王熙为监修总裁官。<sup>③</sup>此次修史主要是为“开国功臣作传”，“俟作传毕，可录出，分给其子孙各一通，令藏于家。”<sup>④</sup>然其纂修进程缓慢，终康熙一朝未毕。雍正元年九月，雍正帝指出：“皇考圣祖仁皇帝特敕内阁、翰林院诸臣，纂修三朝国史，用扬列圣之鸿谟，并及诸臣之劳绩，迄今尚未编辑……凡于指授所及，能显立功勋、诚敬任事之大臣，与夫轶群出众有才之人，若不及今博采闻见，荟萃成编，恐阅世久远，或致阙略。著将国初以来文武诸臣内立功行间、诚敬任事、卓越之才，有应传述者，行文八旗。将诸王、贝勒、贝子、公以及文武大臣之册文、诰敕、碑记、功牌、家传等项详加查核，暨有显绩可纪者，亦著详察，逐一按次，汇成文册。”<sup>⑤</sup>根据雍正帝的旨意，内阁大学士等于十一月议奏：“国史记载，传信万世，应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有功任事之臣，博采见闻，查核一切档册，陆续作传。其满汉监修、副总裁等官，恭候钦定。”<sup>⑥</sup>

然而，尽管纂修功业、政绩卓著诸臣列传是国史馆的主要任务，且有康、雍二帝重视，却终因史馆体制、职能的不完善而造成纂修进展不尽如人意。这些情况无疑对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的撰写有着巨大影响：官方重史的风气是弘旺修史的背景和基础，而人物传纂修成果的乏善可陈又成为其修史的动力之一。

#### 2. 私家著史的启发

官方修史蔚然成风的同时，私家修史亦成就斐然。

<sup>①</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2，第5页。

<sup>②</sup> 《清圣祖实录》卷145，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乙未。

<sup>③</sup> 《清圣祖实录》卷145，康熙二十九年四月乙丑。

<sup>④</sup> 《清圣祖实录》卷225，康熙四十五年六月丁亥；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第52页。

<sup>⑤</sup> 《清世宗实录》卷11，雍正元年九月丙午。

<sup>⑥</sup> 《清世宗实录》卷13，雍正元年十一月戊子。

顺康时期,经历了麦秀黍离之悲的明朝遗民在“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精神支柱下,闭门著述,潜心史学,通过著史或寄亡国之痛,或以“明道救世”。据全望祖统计,明清之际所修野史有千余家。<sup>①</sup>如:吴伟业《绥寇纪略》、孙奇逢《甲申大难录》、彭孙贻《平寇志》、王夫之《永历实录》、顾炎武《圣安纪事》、查继佐《罪惟录》、黄宗羲《行朝录》、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等等,均是传世的优秀之作,所书内容多为官方史书所未记。

所谓“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很多史家都是在困厄之时,或生死之际,寄情于修史。司马迁如此,清初史学家亦如此。弘旺是否也由此萌发纂史之心?少年时期的弘旺贵为皇孙,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和从政能力培养,然而刚刚步入青年时代,尚未施展抱负,便身陷囹圄,成为重犯。即便是获赦之后,既无一官半职,以酬己志;且被限制自由,“不准出门”。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弘旺效仿清初史家走上修史著书以存言立身之路,并通过私修史书揭露官方所讳言、篡改而又关乎著者自身利益的史实。就修史初衷而言,弘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清初史家的启发。另外,弘旺作为“大罪犯之子”被散禁在家,客观上有充足的时间来专事修纂。弘旺既借修史以打发百无聊奈的日子,又因有足够的闲暇从而保证费时费力的修史成为可能。

### 3. 爱新觉罗家族的文化传统

清朝皇室极重子弟教育。早在入关前,努尔哈赤就意识到文化素养培育的重要性。天命六年(1621)七月,努尔哈赤谕令八旗贵族子弟“不勤勉地学,不通文理,就要治罪。”<sup>②</sup>皇太极也强调贝勒大臣子弟要“读书明道理”,规定凡在八岁至十五岁之间者,“俱令读书”。<sup>③</sup>康熙帝玄烨经常到课读处亲加监督课考。<sup>④</sup>清人吴振械曾言:“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sup>⑤</sup>据恩华《八旗艺文编目》对满族著作人进行统计得知,爱新觉罗家族的著作人几乎占了八旗满洲作者的四成。<sup>⑥</sup>除私家著述蔚为大观外,清代官修史籍的编纂也多有皇子、皇孙参与其中,如允禩负责监修了乾隆朝《大清会典》,允禄奉敕编纂了《上谕内阁》、《上谕八旗》等,允祜编纂了《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弘昼主持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初集》的编修。

弘旺除了受到清宗室稽古右文之风浸洽外,也受到祖、父的较大影响。其父允禩为笼络

<sup>①</sup> 谢国祯:《增订晚明史籍考·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按,闾红柳在《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中指出清初私史至少有500余部。

<sup>②</sup>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分册,辽宁大学历史系1979年版,第40页。

<sup>③</sup> 《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庚子。

<sup>④</sup> 白晋:《康熙帝传》,见《清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1页。

<sup>⑤</sup> 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4,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sup>⑥</sup> 参见关纪新:《〈八旗艺文编目〉检读札记》,《民族古籍》1996年第1期。

江南士人，曾托何焯之弟在南方各处买书甚多。<sup>①</sup>弘旺自称“纯工广览”，应该与其父的这批藏书不无关系。其祖康熙帝曾言“二十一史，朕皆曾披阅”<sup>②</sup>，弘旺自幼养育内廷，受康熙帝之潜移默化，对史书的兴趣较为浓厚。这些情况都为弘旺创作《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一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4. 文字狱的影响

为维护封建统治，清廷厉行文化专制政策，“文字狱”屡有发生，康雍乾时期尤为盛行。士人“非惟时事不敢论议，即陈古经世之书，亦不敢读矣”。<sup>③</sup>其中惩治最严厉、影响最恶劣的文字狱案件大多都是因私修史书而罹罪。例如顺治四年（1647）的函可《变记》案、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鑑《明史》案、康熙三年（1664）的孙奇逢《甲申大难录》案、康熙五十二年（1714）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三年（1725）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案、雍正七年（1729）的陆生楠论史案等等。这种情况导致了清中期私家修史的式微不振。弘旺的《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问世于高压之下，可见作者的决心和勇气。但同时也要看到，该书成于乾隆十四年，此时正是文网相对宽弛的时期。乾隆帝即位之初，采取怀柔政策，赦免前朝各起文字狱案的涉及人员，并谕令“嗣后凡一切章疏，以及考试诗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杼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sup>④</sup>随后又采纳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的建议，规定“妄举悖逆者，即反坐以所告之罪”，承审官员“有率行比附成狱者，以故入人罪律论”。<sup>⑤</sup>这些规定大大缓和了雍正朝以来的紧张氛围。当时吴中歌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sup>⑥</sup>之语，与雍正朝的“雍正钱，穷半年”<sup>⑦</sup>形成强烈对照。这段时期，文字狱几近绝迹，思想界相对开放，从而使得《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的纂修成为可能。乾隆十六年（1751），以“伪孙嘉淦奏稿”案为起始，文字狱死灰复燃，且越演越烈。从乾隆十六年至四十八年，载于史册的文祸有一百三十余起之多。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家藏明末野史案发，自此厉行查办禁书活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乾隆帝谕令：“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sup>⑧</sup>全国上下多畏祸而自行烧毁家藏禁书。这大约也是《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撰成之后一直止于私藏，并未刊印的原因。其中述及雍、乾两朝史事的《皇清通志纲要》卷5、卷6现已阙佚，很可能是因为这两卷所述内容敏感，容易招祸而被弘旺

<sup>①</sup> 《文献丛编》第1辑，《允祺允禧案·秦道然口供》。

<sup>②</sup> 《清圣祖实录》卷274，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庚戌。

<sup>③</sup> 小横香室主人：《清代野史大观》卷3，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页。

<sup>④</sup> 《清高宗实录》卷5，雍正十三年十月辛巳。

<sup>⑤</sup> 《清高宗实录》卷13，乾隆元年二月辛巳。

<sup>⑥</sup> 徐珂：《清稗类抄》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5页。

<sup>⑦</sup> 《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页。

<sup>⑧</sup> 《清高宗实录》卷964，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丙戌。

自行毁去或者另行密藏。

#### （四）史料来源

“历史书按照历史家处理材料的态度和性质，一般可分为‘著作’与‘编述’两种。举凡前人所无，而为个人创造之书，谓‘著作’；凡有所依凭，加以编次、说明之书，谓‘编述’。著作的目的在于发明见解，创立新说；编述的目的在于汇集资料，加以叙述说明。清人焦循说：‘人未知而已先知，人未觉而已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惑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sup>①</sup>

按照上述对史书的分类方法衡量《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无疑它应属于“编述”一类。受“编述”性质的影响，史料的采择决定着史书内容的优劣。弘旺在自序中说“敬阅圣朝五世诸书，会为一牒”，道出了此书的史料来源。然“圣朝五世诸书”究竟包括哪些？首先有必要弄清楚乾隆十四年之前，也就是弘旺完成此书之前，清廷进行了哪些当代史的修纂活动。

前已述及清代修史之盛，入关之前就有了以本民族文字，按编年记事的方式，记录统治者军政活动及言论的《满文老档》，后又修成《太祖武皇帝实录》；入关后至乾隆十四年之前，除编修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实录、五朝圣训，康、雍朝起居注等例修史书外，官方修纂的史书主要还有：

1. 《清会典》：初修于康熙二十九年（1790），记崇德元年（1636）至康熙二十五年事。雍正十年（1732）重修，续康熙二十六年至雍正五年事。
2. 《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雍正九年（1731）奉敕编。
3.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雍正九年奉敕编。乾隆六年（1741）续编雍正八年至十三年上谕。
4.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雍正十年奉敕校刊，乾隆三年告成。
5. 《八旗通志初集》：雍正五年敕撰，乾隆四年告成。
6. 《大清一统志》：乾隆八年成书，俗称乾隆旧志。记事时间至康熙朝止。
7.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雍正十三年修，乾隆九年编竣。详述满洲姓氏之源与始居之地，以及子孙归顺时间、官阶、勋绩。
8. 《平定三逆方略》：康熙二十一年始修，康熙二十五年告成。记平定三藩之乱始末；

<sup>①</sup> 赵吉惠：《历史学方法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1页。

9. 《平定察哈尔方略》。康熙二十一年始修，康熙二十五年告成。记康熙十四年平定察哈尔布尔尼叛乱事；

10. 《平定海寇纪略》：康熙二十二年敕纂，记平定台湾郑氏事；

11. 《平定罗刹方略》：康熙二十四年始修，康熙二十八年成书，记抗击沙俄入侵事；

12. 《亲征平定期漠方略》：康熙三十六年敕纂，记三征噶尔丹始末；

13. 《钦定平定金川方略》：乾隆十三年敕纂，记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征大金川事。<sup>①</sup>

经过逐一比对，发现以编年性质为主的《皇清通志纲要》许多地方与同属编年体史书的《清实录》内容相似或相同。而《元功名臣录》、《松月堂目下旧见》则与《八旗通志》在纂修方法、体例和分类上有近似之处。

### 1. 与《清实录》的异同

在此，我们以太宗朝为例，抄录几条史料，比较《皇清通志纲要》卷2与《清太宗实录》的异同：

例1：对于八大臣的设立，《皇清通志纲要》卷2的记载是：

天命十一年九月丁丑，太宗与诸贝勒定议，设八大臣为固善额真，总理一切国政，凡会议与诸贝勒偕坐共议。镶黄额驸达尔汉，正黄纳穆泰，正白喀克笃礼，镶白车尔格，正红额驸和硕图，镶红博尔金辖，正蓝拖博辉，镶蓝顾三台额驸。又设十六大臣佐理国政，审断狱讼，不令出兵驻防。镶黄伊孙、达朱护，正黄拜尹图、楞额礼，正白孟阿图、阿山，镶白吴拜、萨穆什喀，正红布尔吉、叶克舒，镶红吴善、绰和诺，正蓝屯布禄、萨璧翰，镶蓝舒赛、康喀赖。又设十六大臣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镶黄多内、杨善，正黄宗室巴布泰、巴奇兰，正白康古礼、阿达海，镶白图而格、伊而登，正红汤古代、察哈喇，镶红哈哈纳、叶臣，正蓝昂阿喇、觉罗色勒，镶蓝穆克坦、额孟格。<sup>②</sup>

《清太宗实录》中对此的记载是：

天命十一年九月丁丑……上以经理国务，与诸贝勒定议，设八大臣，正黄旗以纳穆泰、镶黄旗以额驸达尔哈、正红旗以额驸和硕图、镶红旗以侍卫博尔晋、镶蓝旗以顾三台、正蓝旗以拖博辉、镶白旗以车尔格、正白旗以喀克笃礼为八固山额真，总理一切事务。凡议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凡事皆听稽察。又设十六大臣，正黄旗以拜尹图、楞额礼，镶黄旗以伊孙、达朱户，正红旗以布尔吉、叶克书，镶红旗以吴善、绰和诺，镶蓝旗以舒赛、康喀赖，正蓝旗以屯布禄、萨璧翰，镶白旗以吴拜、萨穆什喀，正白旗以孟阿图、阿山为之，佐理国政，审断狱讼，不令出兵驻防。又设十六大臣，正黄旗以巴

<sup>①</sup> 参见《国朝宫史》卷22-36，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5，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sup>②</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2，第3页。

布泰、霸奇兰，镶黄旗以多内、杨善，正红旗以汤古代、察哈喇，镶红旗以哈哈纳、叶臣，镶蓝旗以孟坦、额孟格，正蓝旗以昂阿喇、色勒，镶白旗以图尔格、伊尔登，正白旗以康古礼、阿达海为之，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sup>①</sup>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内容的表述，还是行文措辞，两者都较为一致。唯有个别人名翻译稍有不同，如：《纲要》的“达尔汉”，《实录》作“达尔哈”；《纲要》的“博尔晋辖”，《实录》作“侍卫博尔晋”；《纲要》的“达朱护”，《实录》作“达朱户”；《纲要》的“叶克舒”，《实录》作“叶克书”；《纲要》的“巴奇兰”，《实录》作“霸奇兰”；《纲要》的“穆克坦”，《实录》作“孟坦”。

例 2：关于“议设统兵将帅”的记载：

《皇清通志纲要》卷 2：

七月庚寅日，上御殿，集诸贝勒大臣，议设统兵将帅。每固山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设甲喇额真一员。定世职所袭世数。<sup>②</sup>

《清太宗实录》卷 9：

庚寅，上御殿，集诸贝勒大臣，议设统兵将帅。每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sup>③</sup>

本条除了“固山”下少“额真”二字外，其余完全和实录一样。

例 3：关于红衣大炮的记载：

《皇清通志纲要》卷 2：

是岁本国初造红衣炮成。铸曰：“天祐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乌翰自此始。共造红衣炮七位，炮子八千五百，小炮子八万五千。督造大将军炮、总兵官、石古里额駙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大相、奚守位，铁匠刘计平。<sup>④</sup>

《清太宗实录》卷 8：

造红衣大将军炮成。铸曰：“天祐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总兵官额駙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奚守位；铁匠刘计平。先是，我国未备火器，造炮自此始。<sup>⑤</sup>

此条史料，两者所述仍大同小异。

<sup>①</sup> 《清太宗实录》卷 1，天命十一年九月丁丑。

<sup>②</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 2，第 18 页。

<sup>③</sup> 《清太宗实录》卷 9，天聪五年七月庚寅。

<sup>④</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 2，第 20 页。

<sup>⑤</sup> 《清太宗实录》卷 8，天聪五年正月壬午。

例 4: 皇太极与明朝交通文书方面:

《皇清通志纲要》卷 2:

丙申, 至通州度河, 营于城北, 传谕各城曰: “满洲国皇帝谕绅衿军民: 我国素以忠顺守边, 叶赫与我, 原属一国, 尔万历皇帝干预边外之事, 离间我国, 分为二, 曲在叶赫强为庇护, 直在我国强欲戕害, 屡肆欺陵, 大恨有七, 我知其终不相容, 故告天兴师。天直我国, 赐我河东地, 我太祖皇帝意固宁居, 遣人致书讲和, 不见允从。既而天又赐我河西地, 复屡次遣人讲和, 尔天启、崇禎皇帝仍加欺陵, 使去满洲国皇帝号, 毋用自制国宝, 我亦乐于和好, 遂欲去帝称汗, 令尔国铸印给用, 又不允行。故我复告天兴师, 由捷径而入, 破釜沈舟, 断汪还旆。夫君臣者, 非牧民之父母耶? 尔明君臣不愿和好, 而乐兵戈。今我兵至矣, 归顺者必加抚养, 违抗者不得不杀, 非我杀之, 乃尔君臣杀之也。谓我国偏小, 不宜称帝, 古之辽、金、元, 俱自小国成帝业, 亦曾禁其称帝耶! 且尔朱太祖, 昔尝为僧, 赖天佑之, 俾成帝业。天运循环, 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 有匹夫而起为天子者, 此皆天意, 非人力所能为也。我以抱恨之故兴师, 恐不知者以为恃强, 故此谕知。”<sup>①</sup>

《清太宗实录》卷 5:

丙申, 是日, 上至通州渡河, 驻营通州城北, 传谕各城曰: “满洲国皇帝谕绅衿军民知悉: 我国素以忠顺守边, 叶赫与我, 原属一国, 尔万历皇帝妄预边外之事, 离间我国, 分而为二, 曲在叶赫而强为庇护, 直在我国而强欲戕害, 屡肆欺陵, 大恨有七, 我知其终不相容也, 用是昭告于天, 兴师致讨。天佑我国, 先赐我河东地, 我太祖皇帝思戢干戈, 与民休息, 遣人致书讲和, 而尔国不从既而天又赐我河西地, 我复屡次遣使讲和, 尔天启皇帝、崇禎皇帝仍加欺陵, 使去满洲国皇帝号, 毋用自制国宝, 我亦乐于和好, 遂欲去帝称汗, 令尔国制印给用, 又不允行, 以故我复告天兴师, 由捷径而入, 破釜沉舟, 断不返旆。夫君臣者, 非牧民之父母耶? 尔明之君臣, 视用兵为易事, 漠然不以爱民为念, 不愿和好, 而乐兵戈, 今我军至矣。用兵岂易事乎? 凡尔绅衿军民, 有归顺者, 我必加抚养, 其违抗不顺者, 不得已而诛之, 此非予诛之, 乃尔君自杀之也。若谓我国偏小, 不宜称帝, 古之辽、金、元, 俱自小国, 而成帝业, 亦曾禁其称帝耶! 且尔朱太祖, 昔曾为僧, 赖天佑之, 俾成帝业, 岂有一姓受命, 永久不移之理乎! 天运循环, 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 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此皆天意, 非人之所能为也! 上天既已佑我, 尔明国乃使我去帝号, 天其鉴之矣! 上天既已佑我, 尔明国乃使我去帝号, 天其鉴之矣! 我以抱恨之故兴师, 恐不知者以为恃强征讨, 故此谕知。”<sup>②</sup>

<sup>①</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 2, 第 14 页。

<sup>②</sup> 《清太宗实录》卷 5, 天聪三年十一月丙申。

此处也仅是个别字句比《实录》有所减省，所述内容大体相同。除此之外，《皇清通志纲要》卷2还详尽记录了皇太极时期历次与明朝君臣交往的文书、信件，如：天聪元年《致宁远巡抚袁崇焕书》<sup>①</sup>、天聪三年《遗遵化巡抚王元雅书》<sup>②</sup>、天聪八年《致明国官员、军民书》<sup>③</sup>、《透明代王书》<sup>④</sup>、《致曹大将军（曹文诏）及众官书》<sup>⑤</sup>、《明崇祯帝为间谍我军之书》及《满洲国皇帝致明国皇帝书》<sup>⑥</sup>等。具体内容基本上都和《清太宗实录》所载相差无几，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清制，实录定稿后，抄成满、蒙、汉三种文本，各写五份，分藏在内廷、乾清宫、皇史宬、盛京崇谟阁及内阁实录库。一般认为，实录修成后，仅供皇帝参阅，有关档案表明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例1，“庄亲王允禄奏请将八旗所藏实录送交内阁备查折”：

和硕庄亲王臣允禄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为查八旗袭职、管佐领之本源，现八满洲旗俱藏有所抄实录，倘有争职、查明佐领之事，可以此为据查看。惟查看时，虽都统亲自查看，然旗下人众，泄露、编造之处，盖不能免。或有不晓事之人，借查档之便，见与伊祖名相似者，即记下，做为一事，固执反复诉讼，因旗下不能裁断，仍需查内阁之实录，无圈点档，或行文户、兵部，查旧档。由此观之，八旗所藏抄写之实录并无益，且徒争职生事，伏祈降旨，将八旗所藏查核后，送交内阁。旗下倘有应查之项，照旧例行文内阁，查实录，无圈点档时，事可爽利为一，且争讼之项亦可少。应否之处，伏祈主子睿鉴。为此谨奏。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八日<sup>⑦</sup>

例2，《太仆寺少卿丁柱奏报查明佐领渊源并保实录机密事折》：

太仆寺少卿奴才丁柱谨奏：为恭陈管见事。

奴才看得，八旗末明之佐领，俱查藏于内阁之实录，方获知渊源。此项事，俱在天命元年至崇德八年，此三十年内。但此查俱由该旗大臣、甲喇官员，率领催、披甲等，前往内阁细查实录。奴才愚意，实录者，甚关重要，不宜外面小人任看。现既复修实录，仿交内阁，

<sup>①</sup> 参见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2，第6-7页；《清太宗实录》卷2，天聪元年正月丙子。

<sup>②</sup> 参见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2，第13页；《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月辛巳。

<sup>③</sup> 参见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2，第27页；《清太宗实录》卷19，天聪八年七月壬辰。

<sup>④</sup> 参见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2，第27-28页；《清太宗实录》卷19，天聪八年七月丁酉。

<sup>⑤</sup> 参见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2，第28-29页；《清太宗实录》卷19，天聪八年七月戊辰。

<sup>⑥</sup> 参见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2，第29-30页；《清太宗实录》卷19，天聪八年七月丁丑。

<sup>⑦</sup>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2422页。

将所有佐领渊源之情由，按年月日，逐一查明，另立档册。嗣后若有查佐领之美事，惟找出档册查之。如此，实录可不被外面小人任意见之，查佐领渊源之情由亦可不误。此可否应行之处，伏祈圣主睿鉴，为此谨奏。

原注：丁柱此奏未议行。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sup>①</sup>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实录》虽然是藏诸秘阁，但“八满洲旗俱藏有所抄实录”，不惟都统大臣可以随时查看，即便是“外面小人”也可“任意见之”。其实，不惟旗下诸人可以借查佐领渊源为由查阅实录，朝中汉人大臣也能有机会翻阅实录。戴名世在《吴江两节妇传》结束的赞语中，提到：“吾尝读顺治实录，知大兵之初入关也，淄川人孙之獬即上表归诚，且言其家妇女俱已效国装。”<sup>②</sup>可见，在清代人们查阅、传抄前朝《实录》的现象较为普遍。从允禄、丁柱所奏并未议行的处理结果来看，清统治者对《实录》的外流并未为意。从弘旺方面来说，他虽然行动受限，但前文也提及他具有较强的结交能力，央得他人代为查抄《实录》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何况，从允禄的奏折看，八旗所藏实录很可能是保存在各都统处，而弘旺的亲妹夫孙五福即在“乾隆十三年四月任副都统”<sup>③</sup>。又，前文已述《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纂成于乾隆十四年。因而，无论从亲谊关系，还是修书时间来说，弘旺从妹夫处借得《实录》以作写作参考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 2. 与《八旗通志初集》的关系

《八旗通志初集》是详细记述清八旗制度的官修史书，鄂尔泰等人于雍正五年(1727)奉敕纂修，乾隆四年(1739)成书。该书以八旗兵制为经，以八旗法令、职官、人物为纬，有志、表、传三个部分。志分为旗分、土田、营建、兵制、职官、学校、典礼、艺文；表分为封爵、世职、八旗大臣、宗人、内阁大臣、部院大臣、直省大臣、选举；传分为宗室王公、名臣、勋臣、忠烈、循吏、儒林、孝义、烈女。参见上文对《名臣录》、《旧见》内容的介绍，可知二书与《八旗通志初集》多有重合。

### (1) “表”

《八旗通志初集》卷75-82的“封爵世表”记录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至辅国将军、异姓王公侯伯、一等子至三等子、一等男至三等男的爵位封、袭。而《元功名臣录》上部卷1也依次列了二十五家和硕亲王、十三家多罗郡王、二十家多罗贝勒、十四家固山贝子、十七家镇国公、二十四家辅国公、六家八旗民王、二十八家民公、十家侯、二十七

<sup>①</sup>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2408页。

<sup>②</sup> 戴名世：《戴名世集》卷8，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6页。

<sup>③</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第70页。

家伯的爵位封袭情况。两者的不同在于：《八旗通志初集》所列至雍正朝止，《元功名臣录》则延续至乾隆朝；《八旗通志初集》所列不包括犯罪革爵者，《元功名臣录》则详列了所有受爵者。

《松月堂目下旧见》（以下简称《旧见》）所述基本上与《八旗通志初集》（以下简称《初集》）的“八旗大臣年表”类似。如：《旧见》第一册“宗人府总管大臣”部分与《初集》卷115“宗人府年表”相近。《旧见》第二册“二十四旗都统”部分详列满洲旗分都统、蒙古固山额真、汉军固山额真，这分别与《初集》卷107-108“八旗满洲管旗大臣年表”，卷109-110“八旗蒙古管旗大臣年表”，卷111-112“八旗汉军管旗大臣年表”所述相同。《旧见》第二册“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步军统领”，第三册“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以及第四册“銜仪卫掌卫事内大臣”与《初集》卷113-114“八旗内大臣年表”的内容大体相仿。第五、六册之“将军、直省总督、巡抚、提督”与《初集》卷120-124“直省大臣年表”约略相同。

### （2）“传”

《元功名臣录》卷2、卷3详述八旗宗室王公三十一家，镶黄旗满洲元功名臣四十七家、正黄旗满洲元功名臣六十九家、正白旗满洲元功名臣四十家、正红旗满洲元功名臣二十八家、镶白旗满洲元功名臣四十五家、镶红旗满洲元功名臣三十五家、正蓝旗满洲元功名臣三十四家、镶蓝旗满洲元功名臣二十九家，镶黄旗蒙古元功名臣七家、正黄旗蒙古元功名臣二十一家、正白旗蒙古元功名臣十一家、正红旗蒙古元功名臣二家、镶白旗蒙古元功名臣五家、镶红旗蒙古元功名臣五家、正蓝旗蒙古元功名臣四家、镶蓝旗蒙古元功名臣十三家，镶黄旗汉军元功名臣十六家、正黄旗汉军元功名臣十五家、正白旗汉军元功名臣十家、正红旗汉军元功名臣九家、镶白旗汉军元功名臣十一家、镶红旗汉军元功名臣十三家、正蓝旗汉军元功名臣四家、镶蓝旗汉军元功名臣十二家；共列举二十四旗元功大臣四百八十九家。这部分内容也大体与《八旗通志初集》的“宗室王公列传”、“名臣列传”、“勋臣传”相近，只是详略有所不同。

### （3）“志”

《元功名臣录》卷4“佐领根源、直省军兵马匹”等从体例上来说相当于《八旗通志初集》的“旗分志”、“土田志”、“营建志”、“马匹志”。但所述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如《八旗通志初集》之“旗分志”的叙述方法是详列每旗每佐领的始设时间、承袭状况。而《元功名臣录》之“佐领根源”则是采取统计每旗牛录、佐领数额的方法。如：“乾隆元年八旗满洲共六百七十八佐领。计开镶黄旗满洲五甲喇，每甲喇十七个，共八十五佐领；正黄旗满洲五甲喇，头甲喇十九个，二甲喇十七个，三、四、五甲喇每甲喇十八个，十三年以镶蓝旗拾入二个，共九十二佐领；正白旗满洲五甲喇，每甲喇十七个，共八十五佐领；正红旗满洲五甲

喇，二甲喇十四个，余者十五个，共七十四佐领；镶白旗满洲五甲喇，头甲喇十六个，余者十七个，共八十四佐领；镶红旗满洲五甲喇，头甲喇十八个，余者十七个，共八十七佐领；正蓝旗满洲五甲喇，头甲喇十六个，余者十七个，共八十四佐领；镶蓝旗满洲五甲喇，五甲喇十七个，余者十八个，十三年抬入正黄旗二个除去，共八十七佐领。”<sup>①</sup>

《八旗通志初集》纂成之后，有多种抄本、刻本存世，较《实录》而言，应该更易见到。且从上述比较内容来看，弘旺似乎较大程度上参考了《八旗通志初集》的编纂方法。

### 3. 与方略的关系

各种有关战争、军事、平乱活动的记载在《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中占有很大篇幅。如《皇清通志纲要》卷4的记事部分，重点着笔于平定三藩、征准噶尔和收复台湾等战事。这一方面可以窥见弘旺对史事、政事的关注点所在，另一方面也和康熙朝频修各种《方略》不无关系。弘旺在“内廷行走”之时，有可能就读到过部分《方略》；况且，多数《方略》在纂成之时就已公开刊印，因此也有可能成为弘旺著述的参阅书目之一。

### 4. 与邸报的关系

邸报，又称邸钞。永瑤《历代职官表》卷12载：“国朝定制，各省设在京提塘官……谕旨及奏疏下阅者，许提塘官誊录事日，传示四方，谓之邸钞。”<sup>②</sup>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新政诏书恭跋》中说：“我国凡百政务，皆以诏书为凭，而诏书又分两种：一为明谕，下之于内阁，刊之于邸报，臣民共见者也；一为廷寄，亦名交片，下之于军机处，不刊于邸报，臣民不能共见者也。”<sup>③</sup>清代邸报的内容大体包括：官员任免、举荐、赏恤，科举典试、灾异情况、军事活动、外交事务等各个方面。清代中下层官员及普通读书人闻知朝政大事的途径就是阅读邸报。萧爽的《永宪录》即是“适阅邸钞，因略记大端”而写成。<sup>④</sup>弘旺著书期间应该也会关注并参阅邸报。已经散佚的《皇清通志纲要》卷5、卷6，所记为雍乾两朝时事，参阅邸报写成的可能性尤大。

### 5. 亲身经历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认为：“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sup>⑤</sup>上述各种史料来源均属于“在文字记录者”。而“在文字记录以外”的“现存之实迹”和“传述之口碑”也被弘旺大量地运用于自己的著述之中。弘旺作为康、雍、乾三朝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躬亲其役或目睹其事之人”，其亲身经历及闻见无疑是《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而且，这部分内容，较之参阅文

<sup>①</sup> 弘旺：《元功名臣录》卷4。

<sup>②</sup> 永瑤：《历代职官表》卷12，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sup>③</sup>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0页。

<sup>④</sup> 萧爽：《永宪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原序”。

<sup>⑤</sup>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2页。

献而成的记述，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校勘价值，值得后人格外的珍视。

## （五）史料价值

就史料价值而言，本书突出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对清初，尤其是入关前，具有满族特色的政治制度有着较清楚的记述；其次，作为亲历者，提供了诸多关于康熙年间政治斗争史的宝贵史料。下面即举例概述：

### 1. 关于清初“五大臣”的设置时间

“五大臣”，是清初特有的一个常用词，指的是努尔哈赤时期设立的一种官职和担任此职的五位大臣：费英东、额亦都、达尔汉、何和礼、安费扬武。各种文献对“五大臣”设立的具体时间记述不一。《满洲实录》载，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又立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扎尔固齐十员。”<sup>①</sup>而同书在癸丑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正月已出现“五大臣”称呼：“太祖曰：‘两国兵连，必吾与诸王及五大臣身先之，但惜诸王大臣等，恐有一二见伤，非为吾身怯惧而止之也！’”<sup>②</sup>《清朝文献通考》载：“甲寅年（万历四十二年，1614）……又置理国政听讼大臣五人。”<sup>③</sup>《清史稿》称“天命建元（万历四十四年，1616），置五大臣，以命额亦都，国语谓之‘达拉哈辖’。”<sup>④</sup>从这些书的记载看，五大臣设立的时间有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十二年（1614）、四十三年（1615）、四十四年（1616）之说。周远廉先生曾提出，五大臣的设立早于以上几种说法，但未指明具体时间。<sup>⑤</sup>

《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里明确记载了任命五大臣的时间是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十二月。《松月堂目下旧见》卷二：“戊申岁十二月，设五大臣佐理国政。”<sup>⑥</sup>《皇清通志纲要》卷一：“（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十二月，命五大臣辅立鸿基：元勋名臣一等大臣费英东、额亦都、达尔汉、何和礼、安费扬武。”<sup>⑦</sup>这也正好印证了《八旗通志初集·安费扬武传》的记载：“戊申年（1608），从征乌喇，败敌有功。十二月，太祖特命与费英东扎尔固齐、额亦都巴图鲁、达尔汉辖、何和理额駙同为五大臣。”<sup>⑧</sup>

另外，弘旺的著述还有三处提到“五大臣”：

（1）《元功名臣录》卷四：“国初，天命年前，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岁，初编设满洲共

<sup>①</sup> 《满洲实录》卷4，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武皇帝实录》记载与此相同。

<sup>②</sup> 《满洲实录》卷3，另参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sup>③</sup> 《清朝文献通考》卷77，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sup>④</sup> 《清史稿》卷225，中华书局1977年版。

<sup>⑤</sup> 周远廉：《清太祖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219页。

<sup>⑥</sup> 弘旺：《松月堂目下旧见》第2册。

<sup>⑦</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1，第9页。

<sup>⑧</sup> 《八旗通志初集》卷167，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8页。

二百四十牛录，每牛录以丁壮三百人，分四旗，设五大臣统之。”<sup>①</sup>

(2)“二十九年辛丑岁，以诸王律服人众，编三百丁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人，分四旗，设五大臣。”<sup>②</sup>

(3)“(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又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札尔固齐十人。”<sup>③</sup>

这里对五大臣设立时间的描述又与上文有相互抵牾处。此处提到的统领四旗的“五大臣”、“理政听讼五大臣”与上文所提的“佐理国政”、“辅立鸿基”的“五大臣”是否所指相同，待考。

## 2. 关于八旗始设时间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的。八旗初建于何年，清史学界尚有不同认识。《满洲实录》记载：“初设有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至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sup>④</sup>至于初设四旗的具体时间，各种《实录》均无记载。《清朝通典》、《清朝文献通考》提出“辛丑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初设四旗。”<sup>⑤</sup>《大清会典则例》亦云：“辛丑年，满洲生齿日繁，诸国归服人众，设四旗以统之。”<sup>⑥</sup>对此，一直有学者表示怀疑，或认为早于此年，或认为晚于此年，或提出“无始建四旗说”。<sup>⑦</sup>

弘旺在著述中对八旗的创建经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元功名臣录》卷4：

国初，天命年前，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岁，初编设满洲共二百四十牛录，每牛录以丁壮三百人，分四旗，设五大臣统之。甲寅岁（万历四十二年，1614）十一月癸酉日朔，以削平诸国，万方朝宗，明岁为天命元年，以三百丁为一牛录，外五牛录设一甲喇，五甲喇设一固山，分为八旗，设辅政四大贝勒，原设理政五大臣，复设十固尔扎齐，设八固山额真统之。左右设二梅勒额真，设囊额真，统理摆雅喇。

又编觉罗十牛录，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抬入上三旗，雍正七年闰七月十一日觉罗牛录分均八旗，每旗四个，共三十二个，仍隶上三旗。<sup>⑧</sup>

<sup>①</sup> 弘旺：《元功名臣录》卷4。

<sup>②</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1，第8页。

<sup>③</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1，第11页。

<sup>④</sup> 《满洲实录》卷4，同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4，《武皇帝实录》卷2。

<sup>⑤</sup> 《清朝通典》卷68，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清朝文献通考》卷179，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sup>⑥</sup>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71，《四库全书》第6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⑦</sup> 日本的稻叶君山1914年提出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说，事后无附议者。李新达《关于满洲旗制和汉军旗制的始建时间问题》（《清史论丛》第4辑）认为满洲旗制始建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李鸿彬、郭成康的《努尔哈赤1601年建旗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5期）、《清入关前主旗贝勒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也谈八旗旗源》（《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1期）等文则认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只编牛录，未建四旗，至万历四十三年始编八旗。

<sup>⑧</sup> 弘旺：《元功名臣录》卷4。

《松月堂目下旧见》第2册:

太祖高皇帝初设四旗,以黄白红蓝色为之,甲寅岁,复镶其纛,分为八旗。众心悦服,万民归降,四夷俱隶版图,乃正大位,纪其岁元,诸位元功大臣辅翼鸿基,帝道遐昌,以蒙汉先服者归隶八旗……<sup>①</sup>

《皇清通志纲要》卷1:

二十九年辛丑岁,以诸王侏服人众,编三百丁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人,分四旗。设五大臣。先我国凡出兵行围,不计人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围时,每一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设一长,领之。其长称牛录额真。至是遂以名官。<sup>②</sup>

从上可知:八旗确实经历了一个从四旗到八旗的转变,初设四旗的时间是辛丑年(1601);改设八旗的时间是甲寅年(1614)。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修成于乾隆十四年,早于乾隆二十九年修成的《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和乾隆五十二年修成的《清朝通典》、《清朝文献通考》,不存在抄录三书的可能,因而可视为“辛丑始建四旗说”的另一个旁证。

值得注意的是:弘旺提到“初编设满洲共二百四十牛录”。1601年改编牛录时,牛录的数目究竟是多少,没有留下确实可靠的记载,孟森先生在《八旗制度考实》一文提出,每旗一牛录,共四牛录。<sup>③</sup>这一说法受到质疑。随后,陈佳华、傅克东、王景泽、张晋藩、郭成康等众多先生均认为初设四十牛录。<sup>④</sup>姚念慈先生根据努尔哈赤当时的兵力统计,认为至少有八十牛录。<sup>⑤</sup>而弘旺则明确指出初设240牛录,虽是孤证,可存一说。

### 3. 关于文馆的记载

文馆(满文系“bithei boo”)是后金时期辅弼汗权的重要机构,也是清代内阁、翰林院的雏形。文馆的最初职责是“翻译汉文书籍”,并“记注本朝政事”。<sup>⑥</sup>其设置对后金政权的发展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史学界一般认为,它始置于天聪三年(1629),因《清太宗实录》有云:“(天聪三年)夏四月丙戌朔,上命儒臣分为两直……”<sup>⑦</sup>《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天聪三年,设文馆于盛京。”<sup>⑧</sup>然《清太宗实录》之言只能证明天聪三年文馆已然存在,并且“儒臣分直”始于此时,不能据此推断文馆设于此时。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修于光绪年间,距文馆创设之时,已有近三百年之遙,其说难免谬误。另外,《清史稿》认为

<sup>①</sup> 弘旺:《松月堂目下旧见》,第2册。

<sup>②</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1,第8页。

<sup>③</sup>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9页。

<sup>④</sup> 参见陈佳华、傅克东:《八旗建立前满洲牛录和人口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王景泽:《论早期满洲牛录》,《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

<sup>⑤</sup> 姚念慈:《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页。

<sup>⑥</sup> 《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四月丙戌。

<sup>⑦</sup> 《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四月丙戌。

<sup>⑧</sup>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内阁》。

“天聪二年，建文馆，命儒臣分直。”<sup>①</sup>但此说早已为学界否定。《词林典故》、《历代职官表》只称“国初，设文馆于盛京”，具体日期语焉不详。《松月堂目下旧见》则明确记载：“我朝太祖高皇帝初创帝业，国初设文馆，以亲近侍臣在馆办事，名其官曰巴克什。至崇德元年，始改内三院，补满洲、汉军大学士、学士等官。”<sup>②</sup>“巴克什”，是满语 baksi 的音译，又作榜式、巴克式、把克式，有儒者、先生、读书人的意思。此条史料明确表明文馆设置于太祖时期，并言简意赅地述及其职官、沿革等。后金（清）官职中“巴克什”、“大学士”、“学士”等称谓出现之始皆可追溯于此。

《皇清通志纲要》对此有更为具体的记载：

（天命三年）正月，设文馆巴克什……是岁，抚顺秀才范文程、文藻来归，授文馆。<sup>③</sup>

天命四年八月，穆胡睦都督孙硕色、希福来归，授以文馆巴克什。<sup>④</sup>

大兵征锦州，以二十人破明千余人；至沙岭，取广宁，守备石廷柱三人以城降，命在文馆行走。<sup>⑤</sup>

宁完我天命年间来归，命文馆办事。<sup>⑥</sup>

除上述数人外，在天命年间担任巴克什一职的还有：“追封大学士觉罗龙什巴克式”、“追封大学士觉罗龙什巴克式”、“追封大学士大海巴克式”、“议政太保文筒大学士希福巴克式”、“硕色巴克式”、“议政太师文忠一等公内大臣索尼巴克式”、“谥文成额尔德尼巴克式”、“库尔缠巴克式”、“三等公蒙古主帅固山额真内大臣吴内格巴克式”、“二等子理藩院参政尼堪巴克什”、“议政太傅兼太子太师谥文肃大学士一等子范文程把克式”、“巴克式希汉”<sup>⑦</sup>等。这些不仅可证天聪三年始置文馆一说为谬，而且显示天命年间文馆已规模初备。

此外，《皇清通志纲要》指出：

（崇德元年）三月辛亥，文馆改为三院：国史、秘书、弘文。<sup>⑧</sup>

……

命改文馆为内三院（原注：五月设立），大学士四员、学士六员。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天聪八年五月中式，本月任，顺治八年闰二月正法。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天命三年来归，任文馆，从征有功。本月任，顺治十一年九月休。弘文院大学士希福，天命四年来归，任文馆，从征有功。本月任，顺治九年十一月卒。秘书院大学士鲍承先，本月任，三年七月改吏

<sup>①</sup> 《清史稿》卷111，《职官志》1，中华书局1977年版。

<sup>②</sup> 弘旺：《松月堂目下旧见》第3册。

<sup>③</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1，第47页。按，同书第51页有几乎重复的记载。

<sup>④</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1，第49页。

<sup>⑤</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1，第57页。

<sup>⑥</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1，第58页。

<sup>⑦</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1，“天命三年”条，第52-53页。另参见弘旺：《松月堂目下旧见》第3册。

<sup>⑧</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2，第32页。

部。学士罗硕、罗绣锦、詹把、高鸿中、胡球、王文奎、雷兴、马国柱、朱延庆、札苏喀巴克什任文馆。<sup>①</sup>

上述材料表明：崇德元年（1636）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五月，正式定内三院官制、规制。然而内三院的规制具体如何，学界历来看法不一。《清史稿》认为内三院每院“各置大学士一人”<sup>②</sup>，这一说法得到普遍认同。《东华录》指出“内国史院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内秘书院大学士二人，学士一人；内弘文院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三院共大学士四人，学士五人。此外，有举人一人随同办事。”<sup>③</sup>然此说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弘旺以切实的人名、任职年月说明三院确实共设“大学士四员、学士六员”，其中秘书院有大学士范文程、鲍承先两人，从而可证《东华录》“内秘书院大学士二人”所记为确，同时亦可纠“内秘书院……学士一人”之谬。除去大学士、学士外，此处尚列“雷兴、马国柱、朱延庆、札苏喀”四人之名，查同书对四人的履历描述可知，他们均为内三院行走，即普通办事人员。如：“雷兴，正黄汉军。天聪八年举人，文馆办事；崇德元年，改秘书院行走。”<sup>④</sup>这恰与《东华录》所说“此外，有举人一人随同办事”相印证，并且可以得知“举人一人”不是指内三院仅有举人一人，而应该是四位大学士各“有举人一人随同办事”。

#### 4. 关于军机处设置时间

军机处为清代所独创，全称“办理军机事务处”。它的出现源于雍正初年西北用兵的需要，后来逐渐转变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中枢机构。军机处的设置，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极权政治发展到高峰的标志之一，对清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军机处究竟创设于何年何月，清代官私记述所载俱欠翔实，且说法不一。席吴璠《内阁志》记载：“雍正中以边事设军需房（后称军机房）于隆宗门外”。<sup>⑤</sup>赵翼《军机处述》谓：“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后名军机处……”。<sup>⑥</sup>王昶《军机处题名记》谓：“先是雍正七年，青海军事兴，始设军机房……”。<sup>⑦</sup>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载：“军机大臣于满汉大学士、尚书、京堂内特简，无定员……创于雍正七年。皇朝通考未载，殆以其兼差而非实官欤”。<sup>⑧</sup>梁章钜《枢垣纪略》谓：“自雍正庚戌（雍正八年，1730）设立军机处，于兹九十余年”。<sup>⑨</sup>光绪《大清会典事例》105 卷载：“乾隆四十八年谕：……自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以来，五十余年，所有谕旨、批奏事件未经发钞者尚多。”《清史稿·职官志》载：雍正十年用兵西北，

<sup>①</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2，第42页。

<sup>②</sup> 《清史稿》卷114，《职官志》1，中华书局1977年版。

<sup>③</sup> 《东华录》崇德一，转引自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sup>④</sup> 《皇清通志纲要》卷2，第50页。

<sup>⑤</sup> 席吴璠：《内阁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页。

<sup>⑥</sup> 赵翼：《檐曝杂记》卷1，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页。

<sup>⑦</sup> 王昶：《春融堂集》卷47，塾南书舍，清嘉庆十二年（1807）刻本。

<sup>⑧</sup>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18，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773页。

<sup>⑨</sup> 梁章钜：《枢垣纪略》，中华书局1997年版，“原序”。

虑倖直者泄机密，始设军机房，后改军机处……。<sup>①</sup>以上诸说或失之于略，或是含糊其辞，或属口耳相传，未有信言。

弘旺《松月堂目下旧见》则明确记载：“雍正年军机大臣：七年六月初十日，以西北两路军兴，钦派怡亲王讳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军机事务……我朝立军机大臣自此始。”1937年，邓之诚根据此条记载，确定军机处的时间为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1729年7月5日），并高度评价了该史料价值：“不惟可补《枢垣记略》及一切纪载之略，而且可以证明《枢垣记略》所载嘉庆四年成亲王以前亲王不入军机之误。”<sup>②</sup>而今，对于军机处的设置时间，学界仍有争论，但有不少学者认同弘旺的记载，倾向于雍正七年说。<sup>③</sup>其可信度高的原因有二：其一，弘旺乃雍乾时期宗室，虽因罪籍身份而被排斥于最高统治阶层之外，但对王朝大事仍十分关注；其二，《松月堂目下旧见》成书于乾隆十四年，此时离设置军机处仅二十年整，可谓是当事人记当时事。

## 5. 关于清初宗室的记载

### (1) 阿济格、多尔袞、多铎三兄弟的历史评价

顺治朝摄政王多尔袞及其两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均为清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多尔袞是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智勇双全，战功卓越，崇德元年（1636），受封睿亲王。崇德八年，皇太极病逝，六岁的福临即位，多尔袞以拥立之功辅政，并以摄政王身份率师入关，定都北京，为清朝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不朽功勋。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被追封为成宗义皇帝。然一月余后，顺治帝福临诏告天下，斥责多尔袞“独专威权”、“显有悖逆之心”，并籍没家产，追夺封典，鞭尸示众。同母兄弟阿济格被赐死、多铎被追降爵位，亲信党羽俱被治罪。<sup>④</sup>顺治十二年，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上疏请求为睿亲王昭雪，遭到顺治帝的痛斥。<sup>⑤</sup>此后一百余年，多尔袞一直背负着“谋逆”的罪名，无人敢为其申辩。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乾隆帝下令为多尔袞昭雪，“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并令补继承袭”；豫亲王多铎“追复原爵”，令子孙世袭罔替。<sup>⑥</sup>革除宗籍的阿济格子孙也被“复还黄带子，列入宗谱”。<sup>⑦</sup>

然而，作于乾隆十四年的《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却给予阿济格、多尔袞、多铎极高褒誉：

<sup>①</sup> 《清史稿》卷114，《职官志》1，中华书局1977年版。

<sup>②</sup> 邓之诚：《谈军机处》，见王锺翰：《王锺翰清史论集》第2册，第1345页。

<sup>③</sup> 参见钱实甫：《清代的军机处》，《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第10页；冯元魁：《军机处与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学术月刊》1981年第10期，第49页；季士家：《浅论清军机处与集权政治》，《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sup>④</sup> 《清世祖实录》卷53，顺治八年二月己亥；卫匡国：《鞑鞑战纪》，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96页。

<sup>⑤</sup> 《清世祖实录》卷88，顺治十二年正月癸丑。

<sup>⑥</sup> 《清高宗实录》卷1048，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辛未。

<sup>⑦</sup> 《清高宗实录》卷1048，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乙亥。

皇十二子英亲王 伟阿济格：俱著勋烈，有大名，功授贝勒，从征功甚。崇德元年，封武英郡王。定鼎燕京，功封英亲王……<sup>①</sup>

皇十四子睿亲王、墨勒根代青贝勒 伟多尔袞：军功屡绩，封贝勒。天聪二年正月，征察哈而回；戊申，赐号。五年，管吏部。崇德元年，封王。三年十月，授奉命大将军。八年八月，二王辅政，命定鼎燕京。五月己亥底定。九月，上至燕，定都焉，乃王之功。<sup>②</sup>

和硕英亲王 伟阿济格：……正蓝，太祖子，有功甚。<sup>③</sup>

和硕德豫叔亲王 伟多铎：……正蓝，太祖子，功甚。<sup>④</sup>

太祖高皇帝 皇十二子、英亲王、贝勒 伟阿济格：正蓝旗，乃上后乌喇纳氏庚辰年生。功勋并著，有大名，勇如古名将，因封贝勒……<sup>⑤</sup>

太祖高皇帝 皇十四子、原追封成宗义帝、睿亲王、墨而根代青贝勒 伟多尔袞：正白旗，乃上后乌喇纳氏壬子年生。聪慧多智，功勋并著，有大名，封贝勒。崇德元年四月，封王。八年八月，摄政。顺治元年四月乙丑，命定鼎燕京……天下统一，有大功焉……<sup>⑥</sup>

太祖高皇帝 皇十五子、德豫通亲王、额尔克楚虎尔贝勒 伟多铎：正蓝旗，乃上后乌喇纳氏甲寅年生。初封贝勒，崇德元年四月，封亲王。顺治元年，往定江、浙、陕、河，凡百五十余阵，有大名……<sup>⑦</sup>

弘旺在书中对人物描述一般着墨甚简，多数仅略记旗籍、生卒及任事年月，十余字而已。而对当时仍背负谋逆重罪的多尔袞三兄弟却不惜笔墨，详加记录，并屡屡赞其“功勋并著”、“有大名”、“有大功”、“有功甚”。这既不符合全书不加褒贬的风格，也有逆于当时朝廷对多尔袞等人的定论。从而既可以窥见时人对于多尔袞冤案的颇有微词，同时也反映出弘旺自身强烈的感情倾向。多尔袞三兄弟获罪的根源在于清初满族贵族内部的权力之争。早在皇太极继立汗位之时，就有传言努尔哈赤生前属意的是十四子多尔袞。<sup>⑧</sup>皇太极去世，多尔袞再次成为皇位候选人，但在各种势力的较量之下，最终只得以辅政王的身份拥立福临即位。辅政期间，多尔袞三兄弟权势烜赫，威胁皇权，为顺治帝所不满。而允禩、允禵、允禔三人亦是如此。康熙晚年，允禩、允禵诸人皆以为允禔会承继皇位，可最终结果是胤禛称帝。胤禛在获得皇位后，对允禩等三人在朝中的势力、声望极为忌憚。最终，多尔袞、多铎、阿济格和允禩、允禵、允禔皆成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弘旺由己及人，产生同病相怜之感亦属情理

<sup>①</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1，第23页。

<sup>②</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1，第24页。

<sup>③</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3，第3页。

<sup>④</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3，第3页。

<sup>⑤</sup> 弘旺：《元功名臣录》卷2。

<sup>⑥</sup> 弘旺：《元功名臣录》卷2。

<sup>⑦</sup> 弘旺：《元功名臣录》卷2。

<sup>⑧</sup> 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7，见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7页。

之中。

### (2) 允禩、允禩卒年问题

允禩、允禩在获罪拘禁期间相继暴亡，死亡日期说法不一：《世宗实录》卷 47 云：“直隶总督李绂以塞思黑于八月二十四日病故奏报。”<sup>⑩</sup>《上谕八旗》：“雍正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今日李绂奏报塞思黑病故”。<sup>⑪</sup>《永宪录》载：“秋九月庚寅，塞思黑死于保定。”<sup>⑫</sup>而《皇清通志纲要》则记为：“皇九子贝子讳允禩……雍正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薨，葬东便门外”。<sup>⑬</sup>《元功名臣录》云：“雍正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卒于保定府。”<sup>⑭</sup>再参以《星源吉庆》第 50 页记载：“允禩……雍正四年丙午八月二十七日巳时卒”，《文献丛编·李绂奏报塞思黑病故折》云：“塞思黑于本月二十七日卯时已经身故。”<sup>⑮</sup>虽然有巳时和卯时之差，但足可证允禩卒于八月二十七日无疑。至于允禩之卒，《世宗实录》卷 48 页 13 上云：“初十日病故”。《星源吉庆》载：“允禩……雍正四年丙午九月初三日卒，年四十六。”<sup>⑯</sup>《元功名臣录》云：“雍正四年九月初八日薨。”<sup>⑰</sup>弘旺乃允禩之子，并亲自料理了其父的后事，所书当较为可信，从而可见《清世宗实录》和《爱新觉罗宗谱》之误。

### (3) 允禩原名问题

《清实录》所书皇十四子名均为“允禩”，而《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则大胆直笔，数次强调允禩本名允禩：

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多罗勤郡王、贝子讳允禩，改讳禩。<sup>⑱</sup>

二月十六日，命抚远大将军王禩以西宁进兵，驻扎穆鲁乌苏……<sup>⑲</sup>

正月初九日，皇十四子禩生。乃皇恭仁皇后生，乃恂王，任大将军。<sup>⑳</sup>

四十八年乙丑，……封世宗雍亲王、皇三子讳祉诚亲王、皇五子讳祺恒亲王、皇七子讳祐淳亲王、皇十子讳 敦郡王、先君八皇子讳禩复贝勒、皇九子讳禩、皇十二子讳恂、皇十四子讳禩贝子。谕宗人府。<sup>㉑</sup>

三月中旬，命皇十四子贝子禩授王抚远大将军，往征。至穆鲁乌苏回兵。六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回京。<sup>㉒</sup>

<sup>⑩</sup> 《清世宗实录》卷 47，雍正四年八月丁亥。

<sup>⑪</sup> 《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 4，《四库全书》第 41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sup>⑫</sup> 萧爽：《永宪录》卷 4，第 47 页。

<sup>⑬</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 4 上，第 8 页。

<sup>⑭</sup> 弘旺：《元功名臣录》卷 1。

<sup>⑮</sup> 《文献丛编》第 2 辑，《允禩允禩案》。

<sup>⑯</sup> 《星源吉庆》第 50 页，学苑出版社 1998 年版。

<sup>⑰</sup> 弘旺：《元功名臣录》卷 1。

<sup>⑱</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 4 上，第 9-10 页。“允”，原为“胤”，雍正帝即位后，他的诸兄弟为避帝讳，奉命改“胤”为“允”。

<sup>⑲</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 4 上，第 71 页。

<sup>㉑</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 4 下，第 16 页。

<sup>㉒</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 4 下，第 55 页。

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抚远大将军王讳允禩，改讳禔。<sup>①</sup>

《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是目前所知唯一一部披露皇十四子曾名“允禩”的私家著述。清代各种官方史书均未提及“允禩”或“胤禩”二字，惟康熙五十年武英殿版《清圣祖御制文集》中载：“兹值复立皇太子大庆之日，胤祉、胤禩、胤祺俱著封为亲王，胤佑、胤口俱著封郡王，胤禧、胤禔、胤禩俱著封为贝子。”<sup>②</sup>此外，康熙朝满文档案中提及皇十四子时均为“in jeng”（胤禩）<sup>③</sup>。可见，弘旺所言并非虚妄。耐人寻味的是，终雍乾之世，康熙帝皇十四子都被称为“允禔”，弘旺与允禔同朝相处，却在所写书中反复强调“允禩”一名，似乎颇有深意。

#### （4）圈禁允祥的问题

允祥乃康熙帝皇十三子，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生母是敏妃章佳氏。允祥14岁时，生母去世，改由德妃照顾，与德妃长子胤禩关系要好。胤禩即位之后，对允祥倍加倚重，并给予他“忠敬诚直、勤慎廉明”的极高褒誉。而允祥也克尽臣弟之道，鞠躬尽瘁，在雍正朝前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颇有能力的皇子，允祥在康熙朝晚期却是默默无闻的。雍正帝对此的解释是允祥素来“敬谨持身”，置身于诸子争立风波之外，“从不使皇父担忧”。<sup>④</sup>然而弘旺通过著述透露事实并非如此。《皇清通志纲要》载：“（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圈禁。”<sup>⑤</sup>

这里明确指出允祥曾在一废太子时期被圈禁。虽然《清圣祖实录》对此讳若莫深，但在《雍正起居注册》中仍可找到允祥获罪的蛛丝马迹：“怡亲王前因二阿哥之事无辜牵连，一时得罪，皇考随即鉴宥。”<sup>⑥</sup>乾隆朝人萧爽的《永宪录》亦载：“胤祥戊子九月以旧东宫事波及，亦削贝子。”<sup>⑦</sup>由此可证弘旺所言非虚。所以，康熙四十八年第二次分封皇子时仍无允祥之名，他是年长皇子中唯一一位在皇父生前没有受封之人。若非过愆甚重，断不至此。四十九年（1710）六月，康熙帝在允祉、允祥和允禔三人的请安折上朱批：“胤祥并非勤学忠孝之人。尔等若不行约束，必将生事，不可不防。”<sup>⑧</sup>古时，最重忠孝，被君父视为非“忠孝之人”，可见允祥责之重、过之大。

#### （5）康雍两朝皇位传承

<sup>①</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第68页。

<sup>②</sup> 弘旺：《元功名臣录》卷1。

<sup>③</sup> 《清圣祖御制文集》第3集，康熙五十年武英殿本。

<sup>④</sup> 参见杨珍：《清文档案中所见允禔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sup>⑤</sup> 安双成：《宗札布案满文译稿》，《历史档案》1997年第1期。

<sup>⑥</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第54页。

<sup>⑦</sup>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9页。

<sup>⑧</sup> 萧爽：《永宪录》卷1，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7页。

<sup>⑨</sup> 满文朱批奏折，胤祉等奏，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初十日，转引自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关于康熙去世情形和康熙皇位传承经过，史学界向有争议。官方记载经统治者修饰，语焉不详，且时相抵牾，不足征信。弘旺自序暗示了康熙皇位传承的反常。

《皇清通志纲要》自序：

天命十一年岁次丙寅，八月十有一日，上龙驭升遐。我族祖兄礼亲王父子作议书推戴我太宗文明皇帝，三让而登大宝，称国号曰大清……岁次癸未，八月上旬九日，上龙驭飞遐。我族祖兄礼烈亲王诛其子孙二人，推立我世祖章皇帝立登龙位……顺治十八年岁次辛丑，正月初旬七日，上升遐西归，遗命我皇祖圣祖仁皇帝即登宝位，统御万方……岁次壬寅，冬十一月十有三日，龙驭上宾。遗旨内云：“太祖之子礼亲王饶余王之子孙现今俱各安全，朕身后尔等若能协心保全，朕亦欣然安逝。”所遗皇子三十五位，子孙百有余人。升遐之辰，山林旷野、万民黎庶，无不悲哀如丧己亲。至我世宗宪皇帝统御万邦、朝乾夕惕、军民悦享太平，临御十有三年，岁次乙卯八月下旬二十三日龙驭西归……

《元功名臣录》自序：

天命十一年岁次丙寅，八月十有一日，上龙驭升遐。我族祖兄礼亲王父子三人作议书推戴我太宗文明皇帝，三让而升大宝称国号曰大清……岁次癸未，八月上旬九日，上龙驭升遐，我族祖兄礼烈亲王诛叛子硕托、叛孙阿达理，推立我世祖章皇帝立登龙位……顺治十八年岁次辛丑，正月初旬七日，上升遐西归，遗命我皇祖圣祖仁皇帝即登宝位，统御万方……岁次壬寅，冬十一月十有三日，忽遭大故，龙驭上宾，臣民哀痛，弃血稽顙，山林旷野、南北夷人无不嚎恸，如丧己亲。皇子三十五位，子孙百有余人。至我世宗宪皇帝统御万邦，朝乾夕惕，悦享太平。岁次乙卯，雍正十有三年八月下旬二十三日，升遐西归……

述及其他各帝去世情形，均只用“升遐西归”或“龙驭升遐”等语，而康熙帝去世时用的是“忽遭大故，龙驭上宾”。述及皇位传承，太宗是“三让而升大宝”，世祖是被“推立”，圣祖是受“遗命”，而谈及雍正即位，只称“至我世宗宪皇帝统御万邦，朝乾夕惕……”，并未述及是通过什么方式“统御万邦”。看来，弘旺对康熙帝的突然去世以及雍正帝受遗命而即位存有怀疑。

## （六）编纂缺陷

弘旺终究不是一位优秀的史家，其驾驭史料的能力显得有些不足。所以，《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的内容在许多方面存在诸多偏差和讹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1. 史料取舍欠妥

面对繁浩的史料，该如何取舍，关乎作者的史识高低，也是衡量一部史书的重要标准。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一书虽是参阅“圣朝五世诸书”而纂成，但是他对“圣朝五世诸书”的取舍标准到底是什么，显得有些无规则可循。例如：康熙三十九年条记事中，《皇清通志纲要》只述及一句“命嵩祝、石琳平连山瑶寇。”<sup>①</sup>据《清圣祖实录》和《康熙起居注》载，阅视永定河工程，考试宗室子弟骑射，停宗室科举，谕开科道官风闻言事，皇太后六旬万寿节，定科场官卷取士例等都发生于此年，就算按照弘旺前文一贯重宗室、重八旗的取舍标准，这些事件也该记录在案，但弘旺仅记了“平连山瑶寇”一条。

再如：康熙五十二年条，《皇清通志纲要》只记录了庆贺康熙帝六十寿辰举行千叟宴一事。<sup>②</sup>当年发生诸多重要事件，如正月的科场作弊案；二月的南山集案；五月关于矿禁的諭旨；闰五月于金州设立水师营；六月修辑律吕、算法诸书；七月将革退宗室载入玉牒；八月命蒙古游牧以黄河为界；九月于盛京设水师营，防守海洋；十二月于畅春园增马步兵防守；追给额亦都、安费扬古、鳌拜等世职，令其后人承袭等等，均为弘旺在撰写中所摒弃。

## 2. 史实记载的错误

第一，人物方面的错误。仅举二例。如，《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世祖长女淑慧长公主，下嫁巴林台吉。恪纯长公主，下嫁，十九年薨。”<sup>③</sup>查《清皇室四谱》可知，世祖长女“顺治九年壬辰三月十五日子时生，庶妃陈氏出，十年癸巳十月殇，年二岁。”其余诸女也俱早夭，唯有皇二女得以成人，受封恭愍长公主，15岁时下嫁给瓜尔佳氏讷尔杜。<sup>④</sup>

而淑慧长公主乃皇太极之皇五女，名阿图。其母为孝庄文皇后。“崇德六年(1641)正月，许字喀尔喀博尔济锦氏额駙恩格德里之子索尔哈。八年癸未年十二月出嫁。顺治初夫亡。五年(1648)戊子二月复下嫁巴林博尔济锦氏辅国公色布腾，人称巴林公主。十四年二月封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十二月封和顺长公主，后改封今号。”<sup>⑤</sup>书中言其为“世祖长女”，实乃世祖亲姐。恪纯长公主乃皇太极之皇十四女。其母为皇太极庶妃蒙古察哈尔部奇垒氏。“顺治十年癸巳，年十三，八月下嫁平西王吴三桂子应熊，十四年二月晋封为和硕公主。十六年十二月封建宁长公主，后改封恪纯长公主。康熙十三年四月夫被诛，十九年五月，有疾。圣祖慰藉特厚。四十三年甲申十二月卒，年六十有三。”<sup>⑥</sup>恪纯长公主与世祖是兄妹关系，而非父女关系，另外，“十九年薨”亦误。

另如，《元功名臣录》卷2云：“饶余王长子安和亲王讳岳託：从征有功，顺治十四年十一月晋亲王，康熙二十八年二月薨，子六人。”<sup>⑦</sup>此处应属明显笔误。饶余王阿巴泰子、

<sup>①</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第41页。

<sup>②</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第61页。

<sup>③</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3，第3页。

<sup>④</sup> 《清皇室四谱》卷4，第10页。

<sup>⑤</sup> 《清皇室四谱》卷4，第6-7页。

<sup>⑥</sup> 《清皇室四谱》卷4，第9页。

<sup>⑦</sup> 弘旺：《元功名臣录》卷2。

顺治十四年封亲王的应该是岳乐。岳托乃礼亲王代善子，崇德元年四月，封和硕成亲王，二年八月降贝子，四年于济南军中染天花而亡，追封克勤郡王。

第二，时间方面的错误。例如《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记：“五十八年己亥，元旦日食，未刻。七月朔日食，巳刻。”<sup>①</sup>查《清史稿》得知：“五十八年正月甲戌朔申时，日食七分，次于危。五十九年七月丙寅朔巳时，日食七分，次于柳。”<sup>②</sup>另外，康熙五十九年上谕亦可为证：“去年正月朔日食，方今七月朔又值日食。”<sup>③</sup>可见七月朔出现的那次日食发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而非弘旺所记的康熙五十八年。

又如，《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还提到：“五十年十二月，畅春园复废皇太子允禔圈禁。”<sup>④</sup>查《清圣祖实录》，允禔在康熙五十一年数次随驾出巡。正月，“上以巡幸畿甸，命皇太子允禔……随驾。”<sup>⑤</sup>四月，“上奉皇太后避暑塞外，命皇太子允禔……随驾。”<sup>⑥</sup>八月，“上行围，命皇太子允禔……随驾。”<sup>⑦</sup>直到本年十月，康熙帝“命禁锢废皇太子允禔于咸安宫。”<sup>⑧</sup>可见，弘旺的记述有误。

### 3. 史事不够清晰

第一，词不达意。《皇清通志纲要》卷2：“庚午，谕知阿巴图巴图鲁、巴布祜、奇唐砮儿绝嗣以后不可分其家产，永著为例。”<sup>⑨</sup>读后，惘然不知所云。查《清太宗实录》同年相关条目得知，“上谕曰：前以阿巴图巴图鲁、巴布祜、奇唐古尔绝嗣，众分其家产，大非所宜。嗣后已故功臣无后者，家产不得分散，留给其妻，使自瞻焉。”<sup>⑩</sup>此类错误应该是抄写《实录》时过于仓促、省略所致。

第二，时序混乱。《皇清通志纲要》卷1：“万历戊申四十六年，四月壬寅大兵伐明……闰四月归汉人张儒绅等令议和书称建国，汗备述恼恨七宗……六月乙巳克抚顺城……七月乙巳奉太祖谕，议政五大臣凡议事不可一人独断，一人执政必致生乱云云……八月至黑龙江水结一桥乃渡之，取十一寨……正月往征瓦尔喀……二月往征耀州……己未万历四十七年……”<sup>⑪</sup>文中先述及四十六年四月至八月诸事，再述及正月、二月，明显颠倒了时序。全书诸如此类的错误并不乏见。

<sup>①</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第70页。

<sup>②</sup> 《清史稿》卷37，《天文志》12。

<sup>③</sup>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14，《四库全书》第12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④</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第60页。

<sup>⑤</sup> 《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正月癸丑。

<sup>⑥</sup> 《清圣祖实录》卷250，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丙子。

<sup>⑦</sup> 《清圣祖实录》卷250，康熙五十一年八月癸丑。

<sup>⑧</sup> 《清圣祖实录》卷251，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己巳。

<sup>⑨</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2，第17页。

<sup>⑩</sup> 《清太宗实录》卷8，天聪五年正月庚辰。

<sup>⑪</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2，第46-48页。

#### 4. 内容重复

《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中重复叙述的内容比比皆是，尤其是纪传部分。如：《皇清通志纲要》卷1述及佟养性的小传：

总统汉人总兵官、谥勤惠、子、施古礼额驸佟养性：正蓝汉军，历居抚顺所，商贩为业，以资雄一方。有识量，能役服其乡人。天命初见太祖，功德日盛，密输诚款，为明所觉，收置于狱。寻自狱逃出而归，乃天命三年内。上嘉之，以西特库宗女妻之，赐号。任副将，总统汉人。六年，征辽，功加总兵。天聪五年正月乙未，命总统汉人军民都统。八月，征明。六年卒。分为左右旗，子普汉乃蒙，乃满州佟佳氏。崇德三年卒，六十袭。顺治六年追谥加伯。<sup>①</sup>

同书卷4上再次提到：

谥勤惠、二等子、总统汉军总兵官、赐号施古礼额驸佟养性：世居抚顺所，商贩为业，以资雄一方。祖达尔哈奇。天命初，因密输诚款，为明收置于狱。寻自狱逃出来归。赐阿拜女，号额驸。天命六年授二等总兵官，天聪五年正月以统汉人总兵官，初督造红衣炮，从征数年。天聪六年卒，乃分二旗焉，子嗣。<sup>②</sup>

两处所述为同一人，内容也基本一致，只是繁简略有不同而已。

又如，多铎小传在《皇清通志纲要》卷1第23-24页，卷2第39页，卷3第3页重复三次，在《元功名臣录》卷1、卷2中再次出现，《松月堂目下旧见》里也可见到相同内容。另如额亦都、多尔袞、耿聚忠、费扬古等人均多次重复提及。这其中尤以皇子小传的重复比例和次数最高，一般在述及帝王谱系的时候会提一次，在“宗室袭职表”中又提一次，相关年度大事再提一次。如若是在朝为官者在述及其所在部门时还会再度提及。但具体所述内容一般并无太大变化。

此外，书中脱字漏字严重，尤其是时间上的脱漏，对史料的应用和理解造成了很大障碍。人名、地名、官职名等专有名词前后不统一。如：巴克式又写成巴克什、把克什、把可式、榜式，额亦都又作额宜都、额衣都，阿济格时而又变成了阿吉格，“而”和“尔”就更常常混用、不分了。甚至在同页也会存在同词的不同写法。同时，纪年也不规范：时而年号，时而干支。并且，存在一定的民族和阶级歧视：对少数民族多加“歹”，如“歹回”；对下层常以“贼”呼之。

上述种种失误，有些是因为作者的史学修养不足，对史料驾驭能力不高；或于写作过程中存在疏漏，而成书之后又未及校订、梳理。当然，不能排除有部分谬误是在《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传抄、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出现的。

<sup>①</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1，第60页。

<sup>②</sup>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上，第35页。

### 三、结语

弘旺一生历经了康雍乾三朝。康熙朝时，弘旺贵为皇孙，在皇祖康熙帝的照顾和训育下，过着无忧又显赫的生活；雍正朝时，沦为罪人，被削除宗籍，继而充军、圈禁，可谓受尽厄厄；乾隆朝时，获释归宗，赐予红带，成为闲散宗室，但仍被排斥于权力阶层之外，寂然终老。

弘旺晚年纂修了《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一书，其著书动机如自序中所言：“留传于后世子孙之敬览”。在《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创作过程中，弘旺所采用的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为邸报、官修史书等文字史料，如《清实录》、《八旗通志初集》等，一为亲身经历及见闻等口碑史料，如康熙朝储位之争的相关内容。以上两者互为补充。一方面弘旺选择采用官方史料，摒弃市井传说，保证了史料的相对准确性，另一方面弘旺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充分根据自己的耳闻目见，对官方史料去伪存真，保证了史料的真实性。

明代史家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写道：“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sup>①</sup>这段话言简意赅地指出国史、野史、家史各自的优、缺点所在。弘旺的《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作为一部私人所修的野史，不仅体现了“征是非、削讳忌”的价值，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叙章典、述文献”的功能。另外，王世贞认为野史有“挟鄙而多诬”、“轻听而多舛”、“好怪而多诞”三大弊端，但检视《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几无上述弊端。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史部书之容易湮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所记事实，每易触时主之忌”。<sup>②</sup>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一书修纂于文网最严的乾隆朝，且又披露了种种为官方所讳言的史实，这就造成了其流传不广、几近湮废的命运。在所谓的“康乾盛世”，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史馆修史措施的完善以及文字狱的加强，私家修史趋向冷清。然而弘旺却是此时期敢于私修当代史的寥寥者之一。他的《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从时间上而言，早于成书于乾隆十七年的萧爽《永宪录》和成书于乾隆三十年的蒋良骐《东华录》；从内容上来说，涵盖太祖至高宗六朝史事，涉及政治、军事、人物多方面，较之蒋、萧二书也要丰富得多。值得一提的是，弘旺也是满族宗室私家修史的第一人。

总之，《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虽有种种缺陷，内容本身也良莠不齐，但作为一部

<sup>①</sup>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0，中华书局1985年版。

<sup>②</sup>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私史，它保存了诸多不见于他书的珍贵记载，尤其是关于清初政治史和制度史方面的史料，为后世史家广泛征引，对于深入考察清初政治史、制度史起有其他史籍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该书以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披露了一些官方讳莫如深的事实真相，这也正是它的重要学术价值所在。它对于清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价值，不应为我们所忽视。

## 参考文献与书目

### 档案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 1984 年版。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 1998 年版。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档案出版社 1998 年版。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32 辑（《满文谕折》第 5 辑），台北故宫博物院 1980 年版。
-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文献丛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1930-1932 年版。
-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 1986 年版。
- 北京图书馆编：《清代文字狱史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版。
-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 辽宁大学历史系编：《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辽宁大学历史系 1979 年版。

### 文献

-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五石斋抄本，国家图书馆藏。
-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民国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弘旺：《元功名臣录》，清乾隆十四年（1749）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弘旺：《松月堂目下旧见》，全国图书文献缩微中心，2003。
- 《清实录》，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
-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故宫博物院 1932 年排印版。
- 《爱新觉罗宗谱》，学苑出版社 1998 年版。
- 《八旗通志初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钦定八旗通志》，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辽海出版社 2002 年版。

- 《清朝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 《清史列传》，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 《上谕八旗》，《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上谕内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钦定热河志》，《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万寿盛典初集》，《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清高宗御制诗》，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
- 《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 4 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 白晋：《康熙帝传》，见《清史资料》第 1 辑，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 李肯翊：《燃藜室记述》，见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 1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光绪《清会典》，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 光绪《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台北明文书局 1985 年版。
-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 蒋良骥：《东华录》，齐鲁书社 2005 年版。
- 永瑛：《历代职官表》，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 鄂尔泰、张廷玉等：《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 昭槤：《啸亭杂录》，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 萧爽：《永宪录》，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 赵翼：《檐曝杂记》，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 永忠：《延芬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 吴庆坻：《蕉廊脞录》，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 章乃炜：《清宫述闻》，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 王昶：《春融堂集》，塾南书舍，清嘉庆十二年(1807)刻本。
-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 梁章钜：《枢垣纪略》，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 戴名世：《戴名世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 刘献廷：《广阳杂记》，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 卫匡国：《鞑鞑战纪》，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 席吴璠：《内阁志》，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 徐珂编：《清稗类抄》，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 刘知几：《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 天台野叟：《大清见闻录》，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 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 恩华撰，关纪新点校：《八旗艺文编目》，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
- 吴士鉴等：《清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 张尔田：《遁堪文集》，民国 37 年（1948）铅印本。

#### 今人著作

- 邓之诚：《五石斋文史札记》，见李国章、赵昌平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 63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 1954 年版。
- 萧一山：《清代全史》，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 陈捷先：《雍正写真》，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
- 陈捷先：《满文清本纪研究》，明文书店 1981 年版。
- 陈捷先：《清史杂笔》第五辑，台湾学海出版社 1984 年版。
- 庄吉发：《清代史料论述》（一），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79 年版。
- 庄吉发：《清代史料论述》（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80 年版。
- 庄吉发：《萨满信仰的历史考察》，（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96 年版。
- 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4 年版。
- 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书原因之研究》，台湾华正书局 1983 年版。

- 秦国经：《明清档案学》，学苑出版社 2005 年版。
- 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1-9 卷，中华书局版。
-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 2001 年版。
-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 2003 年版。
-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 2006 年版。
- 郭松义、李新义、李尚英：《清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 年版。
- 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 冯尔康：《清史史科学》，沈阳出版社 2004 年版。
- 周远廉：《清太祖传》，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 周远廉、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
- 孟昭信：《康熙大帝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 白新良主编：《康熙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 1994 年版。
- 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 金恒源：《正本清源说雍正》，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朱彭寿编著：《清代人物大事纪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版。
- 王锺翰：《清史杂考》，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 王锺翰：《王锺翰清史论集》，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 王锺翰：《王锺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王锺翰主编：《满族史研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 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 赵吉惠：《历史学方法论》，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天津出版社 1994 年版。
- 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
- 阙红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 李治亭、张玉兴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张力均：《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

- 李燕光、关捷：《满族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袁闾琨：《清代前史》，沈阳出版社 2004 年版。
- 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 姚念慈：《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 年版。
- 金性尧：《清代宫廷政变录》，（香港）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 杜家骥：《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台北）五南图书 1998 年版。
- 高文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 戴逸、罗明：《清代人物研究》，巴蜀书社 1992 年版。
- 陈乃乾：《室名别号索引》，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 杨廷福、杨同甫编：《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姚伯岳：《中国图书版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 1990 年版。

#### 论文

- 杨珍：《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 6 辑，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 杨珍：《满文档案中所见允禔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中国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
- 杨珍：《康熙帝教子论析》，《满族研究》，2001 年第 1 期。
- 杨珍：《允禔：品性、遭际、时代》，《清史论丛》2009 年号。
- 杨珍：《帝王之家父子关系诠释》，见《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新华出版社 2008 年版。
- 吴伯姪：《苏努研究》，见张先清编：《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 李尚英：《乾隆为多尔袞平反昭雪》，《紫禁城》，1991 年第 6 期。
- 冯佐哲、李尚英：《清宫上书房与皇子读书》，《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 年第 4 期。
- 李尚英：《论“八旗生计”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 年第 6 期。
- 薛瑞录：《溥杰关于雍正杀弟的口碑资料》，《清史研究通讯》，1983 年第 2 期。
- 刘玉文：《清代前期满族传统教育述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 年第 6 期。
- 关纪新：《〈八旗艺文编目〉检读札记》，《民族古籍》，1996 年第 1 期。
- 张双志：《雍正继位新解》，《清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

- 冯尔康：《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
- 玉麟：《“阿其那”、“塞思黑”二词释意》，《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1辑。
- 富丽：《“阿其那”、“塞思黑”新解》，《文史》第10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 沈原：《“阿其那”、“塞思黑”考释》，《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 高翔：《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 郭成康：《雍正密谕浅析——兼及军机处设立的时间》，《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 钱实甫：《清代的军机处》，《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
- 刘子扬：《清代的军机处》，《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 冯元魁：《军机处与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学术月刊》，1981年第10期。
- 尚英：《清代军机处设立的时间及性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3期。
- 赵志强：《军机处成立时间考订》，《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
- 南炳文：《军机处设立时间考辨》，《清史研究集》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吕钊：《清代军机处的设立及其性质——兼与钱实甫同志商榷》，《历史教学》，1963年第3期。
- 俞炳坤：《军机处初设时间新证(上)——兼与七年说和八年说商榷》，《历史档案》，1991年第3期。
- 俞炳坤：《军机处初设时间新证(下)——兼与七年说和八年说商榷》，《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 季士家：《浅论清军机处与集权政治》，《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 安双成：《宗札布案满文译稿》，《历史档案》，1977年第1期。
- 韩光辉：《清代皇族的管理》，《满族研究》，2002年第4期。
- 刘小萌：《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契研究》，《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的莹地与祭田》，《清史论丛》2001年号。
- 刘小萌：《碓房与旗人生计》，《清史论丛》2006年号。
- 李新达：《关于满洲旗制和汉军旗制的始建时间问题》，《清史论丛》第4辑。
- 李鸿彬、郭成康：《努尔哈赤1601年建旗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5期。
- 李鸿彬、郭成康：《清入关前主旗贝勒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 李鸿彬、郭成康：《也谈八旗旗蠶》，《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1期。
- 细谷良夫、陈佳华、刘世哲：《〈八旗通志·旗分志〉的编纂及其背景——雍正朝佐领改革之一》，《世界民族》，1989年第2期。
- 陈佳华、傅克东：《八旗建立前满洲牛录和人口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年第1期。

陈佳华：《八旗制度研究述略》，《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5期。

关克笑：《牛录、固山(旗)编建时间考》，《满族研究》，1997年第3期。

王景泽：《论早期满洲牛录》，《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

滕绍箴：《努尔哈赤时期牛录考》，《民族研究》，2001年第6期。

王锺翰：《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

乔治忠：《清代国史馆考述》，《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3月。

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

李鹏年：《国史馆及其档案》，《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

吴仁安：《清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历史教学》，1981年第2期。

王云松：《清初翰林院沿革考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S1期。

冯尔康：《康熙十四子胤禔改名考释》，《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朱南铎：《雕红丛札》，《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3辑。

王锺翰：《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

乔治忠：《清代国史馆考述》，《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3月。

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

李鹏年：《国史馆及其档案》，《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

姚继荣：《清代档案与官修方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2年第1期。

高进：《清代修史机构的设置及变迁的时段特征》，《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朱金甫：《略论清代官修“方略”的编纂》，转引自中华文史网。

## 后记

“流光容易把人抛”，三年的硕士生涯瞬息而逝。初入师门的惊喜和憧憬仿佛仍在昨天，毕业的愁思离绪竟已至眼前。这三年来，我的导师杨珍先生从学术入门的引领到毕业论文的定稿，从衣食住行的关心到为人处事的教化，无不让我受益良深，终生难忘。尤记三年前的五月，第一次前往导师家拜访时，导师便提出让我以“弘旺与《皇清通志纲要》研究”为毕业论文的设想。在以后的资料搜集、整理中，发现弘旺的另两本书《松月堂目下旧见》、《元功名臣录》同样具有研究价值，且三者亦是整体，不便分开，于是最终定下了《弘旺及其著述研究》这个题目。论文的写作过程，毫不讳言是痛苦的，我缺乏正规学术论文的写作经验，也缺乏对清代政治史和学术史的整体把握。但论文的数次修改过程真的是幸福的，因为有导师不惮其烦的推敲修订，醍醐灌顶般的批评指教。可以说，全文四万余字的字字句句，都凝聚着导师的心血。然而令人惭愧的是，由于学识的浅薄，我并未能完成选题时导师的设想和期望。时不我待，眼下论文必须定稿，答辩必须完成，可是我并不打算就此结束对本文的修正，毕业后的时间我会继续深入对“弘旺及其著述”的探研，希望有一天能补交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在历史所学习的三年里，除了深受导师杨珍先生的帮助外，所长陈祖武先生也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然而我却数度辜负先生的厚望，在此致以我诚挚的谢意和深深的歉意。另外，感谢清华大学何兆武先生对我论文选题的建议；感谢少文所宋和平老师对我满语学习的指导；感谢吴伯娅、李尚英、林存阳、薛瑞录四位先生，在百忙之中耐心阅读拙文，并提供了宝贵意见；感谢清室研究室李世愉、李华川、朱昌荣等诸位师长以及系秘书郑剑英老师一直以来给予我的帮助和爱护；感谢毕游、老莫、微微、晓满和殷芳，从你们身上我学会了很多；感谢师姐李娜、师弟毕卫涛，我会永远珍惜这同门的缘分。

最后，感谢历史所朴实严谨的学风和宽松自由的氛围。在这里，我度过了最难忘的三年。

熊英洁 谨识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于国图文津楼